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heses & Dissertations

Department of Chinese

2006

韋應物詩歌研究

Wai Kuen, Christina TSE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_etd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謝慧娟 (2006)。韋應物詩歌研究 (碩士論文, 香港嶺南大學)。檢自 http://dx.doi.org/10.14793/chi_etd.23

This Thesi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Theses & Dissertation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erms of Use

The copyright of this thesis is owned by its author. Any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thesis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韋應物詩歌研究

謝慧娟

哲學碩士

嶺南大學

二零零六年

韋應物詩歌研究

謝慧娟

論文呈交以符合哲學碩士課程之部分要求

嶺南大學

二零零六年

論文撮要

韋應物詩歌研究

謝慧娟

哲學碩士

唐代詩人韋應物雖在文學史上有一定地位，但歷來對他的研究卻一直欠全面。近年有關韋應物其人其詩的專論漸多，但部份論者囿於傳統分期之說，以至討論有所偏頗；亦有論者側重於詩人某些特質，或因循白居易「頗近興諷」之論，強調詩人的諷喻詩；或從「王孟韋柳」淡雅之說，獨論詩人的閑適詩，雖時有高見，然既未能綜合各類詩來分析、討論，又未與其生平、思想、性格配合來互相闡發。詩人今存詩五百餘首，數量甚多，實難以一言以蔽之。今人林水檉以「相當複雜」來形容韋詩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可謂非常有見地。本文關注韋應物不同風格的詩作之間的關係，希望經梳理後對他的創作歷程和詩風特徵作一全面的探討。

韋應物詩的內容風格雖然多樣化，但主題顯明突出，本文分析有三種；第一種針對時局而生興諷，詩人着眼現實，表現出激越的情緒。第二種往事追憶，詩人通過不斷的精神回溯，試圖為苦悶的現實尋找出路。第三種居官如隱，詩人兼容身處的繁囂塵網與內心的清靜幽境為一體。以上三種主題發展出三類揉合韋應物獨特性情和生活經驗的詩歌作品：興諷詩、追憶詩和吏隱詩。本文將探討主題、作品和詩人的關係，希望研究出推動詩人用詩來興諷、追憶和兼容身心為一的力量。

本文將分為六章：第一章：緒論：韋應物研究概況、研究動機和方法；第二章：韋應物生平略述；第三章：興諷詩分析。第四章：追憶詩分析，此章分為兩節，第一節討論詩人追憶開元盛世並且力求擺脫現實困逼的追憶作品；第二節探討詩人無特定追憶對象但反映長期處於不滿和苦悶狀態的追憶作品。第五章：吏隱詩——詩人對仕宦的態度和天性澹泊融合的結果。第六章：總結。

本人謹聲明，本論文為本人之原創性研究成果，所有引用已發表或未發表之研究作品，均已適當註明出處。

謝慧娟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日

畢業論文核准證

韋應物詩歌研究

謝慧娟

哲學碩士課程

論文審查委員會：

_____	(主席)
許子東博士	
_____	(校外考試委員)
鄧昭祺博士	
_____	(校內考試委員)
司徒秀英博士	
_____	(校內考試委員)
許子濱博士	

導師：
司徒秀英博士

副導師：
李雄溪博士

代教務會核准：

_____

饒美蛟教授
研究及高級學位課程委員會主席

_____

目錄

章節	內容	頁碼
第一章	緒論	1 - 8
	（一）韋應物研究狀況	1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5
	（三）研究方法	5
第二章	韋應物的生平略述	9 - 13
	（一）韋應物的出身	9
	（二）詩人韋應物	11
	（三）韋應物的吏隱生活	12
第三章	興諷詩	14 - 32
	（一）興諷詩釋義	14
	（二）興諷詩的探討	17
	（三）小結	31
第四章	追憶詩	33 - 59
	（一）追憶詩釋義	33
	（二）追憶詩的探討	34
	第一部份：追憶「開元天寶」	35
	第二部份：「開元天寶」以外的追憶	49
	（三）小結	58
第五章	吏隱詩	60 - 80
	（一）吏隱詩釋義	60
	（二）韋應物對仕宦的態度	65
	（三）韋應物的高潔本性	69
	（四）韋應物吏隱詩的藝術特色	73
	（五）小結	81

《韋應物詩歌研究》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韋應物研究狀況

韋應物是唐代重要詩人之一，雖然兩《唐書》未爲其立傳，但從《新唐書·文藝傳》：「若韋應物、沈亞之……，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之。」¹ 及王欽臣(不詳)《韋蘇州集》〈集序〉中引李肇(約 813 前後在世)《國史補》：「開元以後，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韋蘇州」；²元代顧璘(1475-1545)：「韋公古詩當獨步唐室，以其漢魏之質也，其下者亦在晉宋之間」；³ 清代王夫之(1619-1692)：「韋於五言古，漢晉之大宗也」；⁴白居易(772-846)：「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⁵ 可知，韋應物是因爲詩作而「著名」，其中尤以古詩見稱。

韋詩自唐代以還已受到關注，《唐國史補》的作者李肇與韋應物年代相近，

---

¹ 見《新唐書·文藝傳上》，201/2。

² 王欽臣：《韋蘇州集序》，見《韋應物集校注》(下稱《校注》)附錄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 625。

³ 顧璘：《三體唐詩》，見《校注》附錄五，頁 645。

⁴ 王夫之：《唐詩評選》，見《校注》附錄五，頁 649。

⁵ 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與元九書〉《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 2794。

從其「位卑而著名」一語和《新唐書·文藝傳》「班班有文在人間」，可知韋應物在其當世已以詩聞名。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讚美韋應物五言詩「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體」；唐末司空圖(837-908)將他與王維(701-761)並稱，⁶ 後人將他與陶淵明(372?-427)合稱「陶韋」，與柳宗元(773-819)並稱「韋柳」，又與王維、孟浩然(689-740)、柳宗元合稱「王孟韋柳」；嚴羽(不詳，約12世紀)《滄浪詩話》列舉唐詩諸體中，就有「韋柳體」；而王漁洋(1634-1711)更奉他為「神韻」風格的典範，可見韋應物在唐詩史上的重要性。

然而，過去學者對韋應物的關注，始終不及陶、王、孟、柳等詩人。李世英及侯潤章於一九八八年發表的〈近年來韋應物研究之檢論〉指出到一九八六年為止，他們已見到約三十篇有關韋應物的研究，文中羅列了其中十六篇文章。有關韋應物的研究論文當然不只李文所提及的數目，也許由於地域及政治關係，台灣學者的論文就未被提及。自八十年代以後，有關韋應物的研究漸多，學者研究的方法、角度亦趨多元化，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開三個方向：

(一) 韋應物其人、其詩歌的考據：包括生卒年份、入太學的時間、一些詩歌的創作年代及是否出自其手與交遊等考證。

(二) 詩集的輯佚及箋注：

- 1) 陶敏、王友勝校注的《韋應物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2) 阮廷瑜：《韋蘇州詩校注》(台灣：國立編譯館主編，2000)
- 3) 孫望編著：《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2)

(三) 作品的研究及闡釋：

---

⁶ 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右丞、蘇州，趣味澄澹，若清風之出岫。」，見《校注》附錄五，頁641。

韋應物雖以五言古詩見稱，但各類體裁均有嘗試。在現存五百四十四首詩歌中，他有幾近六十首的五絕、三十餘首七絕、一百二十首五律、不足十首的七律，約三十首七古，至於五古則有二百七十餘首。從數量上可以看出，詩人較擅長寫五言詩，其中尤愛寫五言古詩。

作品研究方面，由於韋應物除了寫作不同體裁的詩歌外，詩歌內容及所表現的情志也是多樣化的，近人林水椽以「相當複雜」來形容「韋應物詩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可謂非常有見地。近百年的韋應物作品研究也漸見多元化。由於韋應物素以「高雅閑淡」見稱，故學者普遍較重視其閑適之作，亦有受白居易評韋應物「頗近興諷」之論的影響，而特別強調詩人的諷諭之作。韋應物一生有相當長的時間寓居佛寺，詩中時有山水田園的描寫，這類詩歌遂成某些研究者的研究對象，如台灣學者許綰瑩的碩士論文即以「韋應物的山水詩」為題。其他如一些韋詩注釋、作品鑒賞等短篇則不計其數。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從上一節的討論看，近百年韋應物研究不可說不豐富，許多精闢的見解都給予我們許多啟發，進一步認識這位詩人。然而，韋應物是一個很特別的人物，他少年曾任玄宗三衛侍郎，不學無術，過着放蕩豪縱的生活。後來折節讀書，整個人脫胎換骨，到晚年更鮮食寡欲，至令有些人不相信少年的他曾如此放蕩。一個人從「無賴恃恩私」(〈逢楊開府〉)到焚香掃地、鮮食寡欲，不會是一夜之間的事，而這樣一個人物，前人往往片面地評價他，不是「橫眉怒目」，

就是「焚香掃地」，結論往往失諸籠統。

有些學者很喜歡以分期的方式研究，例如儲仲君於一九八四年發表於《文學遺產》的〈韋應物詩分期的探討〉將韋應物一生分成三期，初期積極向上，中期消沉失望，晚期安逸滿足。這篇文章對後來的研究者影響甚大，不少學者都因循儲說，將韋應物詩作分期研究。然而，當我們細讀韋應物的詩，就會發現這種分期研究有很多毛病。

首先，這種分期乃假設思想感情是直線發展的，變而不復，更能截然劃分。但是人的思想感情卻是複雜的，同一時期可以有不同感受，前一時期出現的思想，在以後可能會重現。再者，這種分期只從政治社會背景來推測，表面上似乎很合理，實際上容易流於公式化，套在其他類似背景的作家亦可得出大同小異的結論。對詩人來說，玄宗之崩而罷三衛、因撲扶軍騎而罷洛陽丞、離京外任滁州刺史，都是一生所受到的打擊，不能以分期來說明他晚年就覺得安逸。而韋應物對百姓的關懷，更不止於早年在長安、洛陽任官之時。另一方面，韋應物愛好淡泊自然的生活很早便在詩中表露出來，譬如在洛陽任上寫的〈任洛陽丞答前長安田少府問〉，他說：「告歸應未得，榮宦又知疏」，已有放棄功名、閑居田園的念頭。⁷ 因此，要全面研究韋應物詩，首先要打破分期的框框。

韋應物是中唐的重要詩人，但歷來的研究者對他不是有所忽略，就是有所偏頗，致使韋氏在唐詩史上的價值未能得到彰顯。本文的撰寫，將在前人研究

---

⁷ 見《校注》，頁 287。

的基礎上，分析韋應物各類型的詩作，期望藉此進一步發掘韋詩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一方面補充前人研究，另一方面亦希望能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思考的方向，使他們注意到一個作家的全面。

第二節 研究方法

幾乎所有討論唐代詩人的學者都喜歡從唐詩分期入手，例如「盛唐詩人李白、杜甫」，「中唐詩人白居易」等。這種用時間作為文學分期緣於古人的習慣，有一定的方便性。有學者認為，唐詩的分期可追溯到唐人殷璠，⁸ 他在《河岳英靈集序》說道：「自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618-626)，微波(指宮體詩餘風)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云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實由主上惡華好樸，去偽從真，使海內詞場，翕然尊古，南風雅調，稱闡今日。」《滄浪詩話》的作者嚴羽將唐詩的流變分成五個階段：初唐之詩、盛唐之詩、大曆以還之詩、元和之詩和晚唐之詩。但嚴羽這分法主要目的不在於分段，而在闡明學詩的門徑，所以讀來就有些含糊不清的地方。

明代高棅將嚴羽「大曆以還之詩」及「元和之詩」合而為中唐詩歌，於是形成了我們熟識的初、盛、中、晚唐四個時期。然而，四期應該分在哪個具體的年代，至今仍有爭議，例如明沈騏〈詩體明辨序〉中對四唐的分期和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定義就不一樣。

---

⁸ 張宗原：〈唐詩的分期〉《唐詩淺說》(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9)。

韋應物生於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7)，約卒於德宗貞元九年(793)，若以沈騏的分法，韋應物前半生屬於盛唐，後半生屬於中唐，大概可稱他為盛中唐人；若以宇文所安的分法，韋應物則全然屬於盛唐人。可是，韋應物雖然生於盛唐，但他有別於其他任何詩人，若非安史之亂爆發，他流落失職，大抵他不會讀書識字，今天也不會有「唐詩人韋應物」。韋應物自代宗廣德二年(764)才開始有詩留存，而自大曆年間(766-780)，詩人創作遂多，他理所當然的應被稱為「中唐詩人」，這可能也是大部份學者稱他為「中唐詩人」的原因。

然而，不少學者都察覺到韋應物詩歌風格有別於一眾中唐詩人，專治大曆詩的內地學者蔣寅在其專著《大曆詩人研究》中雖也提及韋應物，但亦指出他「自成一家之體」；⁹ 沈文凡亦指他是「大曆詩壇上一支獨異的花朵」。¹⁰ 若將韋定性為一個盛唐詩人，他無疑缺乏那種盛唐人獨有的蓬勃的時代性格(即林庚所指的「盛唐氣象」¹¹)，縱然他在詩中表現出積極用世之志，卻缺少盛唐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然而，若將韋氏定性為中唐詩人，其詩亦有異於「氣骨頓衰」(明胡應麟語)的大曆詩人。我以為，韋應物之難於定為盛唐詩人或中唐詩人正反映出韋詩的多樣化。無怪宇文所安在其《盛唐詩》一書第十六章中，專論韋應物，指他是「盛唐的輓歌」。

勉強將詩人分期不但不能全面認識詩人，有時反而成為研究時的障礙，為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轍，本文將打破時代隔閡，不擬從分期入手。詩人性格、思

---

⁹ 蔣寅：《大曆詩人研究》(北京：新華書店，1995)。

¹⁰ 沈文凡：〈大曆詩壇上一支獨異的花朵——論韋應物詩歌的藝術特徵〉(《安徽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科學)》，1989年1月)。

¹¹ 林庚：〈盛唐氣象〉《北京大學學報》(1958年第2期)。

想、感情往往投射於每一類詩歌中，而這正是本文所關注的地方，故本論文以題材分類為基礎，再配合詩人的生平，將焦點放在詩人、詩作本身，對韋應物詩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期望展現詩人作品在題材、風格上的多樣性，更進一步分析每一類詩作的深層意義和藝術特色。細讀韋應物詩集，雖然內容風格多樣化，然不難發現有幾個相當突出的主題，第一類是着眼現實，針對時局的興諷之作，表現出詩人激越的情緒。第二類是對往事的追憶之作，通過不斷的精神回溯為苦悶的現實尋找出路。第三類是居官如隱，兼容繁囂塵網與清靜幽境的吏隱詩。第一類雖有學者提及過，然討論時往往囿於儲仲君分期之說，以為這類作品是詩人早期風格，隨着出仕日久及年歲的增長而逐漸淡化。這明顯與事實不符。而第二類追憶之作是很少學者討論的主題，而我卻以為這一類主題能反映出詩人情志的某一個側面，不容忽視。至於第三類吏隱詩正好反映詩人如何融和混濁的世俗和個人澹泊的情志，很值得深入探討。

韋應物以古澹自然的詩風留名詩史，歷來詩評家多將他與王維、孟浩然、柳宗元歸為一類，認為他們的詩從風格和情思來看，都屬於清澹閑遠一體，而且同樣淵源自陶淵明。¹² 現代的學者更從題材來劃分山水田園詩派，以山水詩來討論王、孟、韋、柳詩的特點，大概是因為他們都愛寫作山水題材，而他們的主要風格都能夠在山水詩中表現出來。雖然韋應物的山水詩很重要，但是本文從詩人的性情、志趣、思想、感情入手，以求韋應物詩的分類，所以一般性的題材劃分，如山水詩，並不適合本文的研究範圍。這不代表本文沒有涉及韋應物的山水詩，我將它們分別歸入追憶詩、吏隱詩中討論，希望從新的角度，

---

¹² 例如清人胡鳳丹《唐四家詩集》將王、孟、韋、柳四家詩輯為一集，又在〈序〉中說：「今獨舉王、孟、韋、柳四家之詩而哀輯之，豈阿所好哉？讀詩至雅頌之什，雍容揄揚，可以獻明堂而荐郊廟，而風之春酒羔羊、碩人適軸，相與詠歌，各言其情，亦太史輶軒所必採，然則詩各不同，亦就其相類者彙之而已。若王與孟與韋與柳，其生平出處，不盡相伴，而其胸襟浩落，蕭然出塵，則遙遙百餘年間，前後若合符節，王則以清奇勝，柳則以清俊勝，韋則以清拔勝，孟則以清遠勝。每當風晨月夕，展卷長吟，如幽士深山，如佳人空谷，令人仿佛遇之。」（見胡鳳丹《唐四家詩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頁1。）

得出新的看法。

本論文共分成六章，首章為緒論：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研究動機及方法；第二章為韋應物生平概述。孟子「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對研究任何一位詩人都有一定的意義，我以為對經歷重大歷史變故的詩人，其作用尤為顯著。經學者傅璇琮、孫望、陶敏等的努力，韋應物的生平事跡大致清晰。這一章的設立有助了解韋氏的生活面貌，更有助了解詩歌所表現的感情。也為後面章節研究韋氏的詩作時，提供一個堅實可靠的基礎。

第三至第五章將以韋詩三類重要主題作研究對象，分別是興諷詩、追憶詩和吏隱詩。每章篇首均會清晰界定該類詩歌的定義，以確定選詩的標準。「興諷」一詞出於白居易，故該章會從白居易〈與元九書〉入手，配合唐人對興諷、興寄的看法，確定興諷詩的定義；而「追憶」一章則會借用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追憶——中國古典文學的往事再現》一書中「斷片」的概念，再配合韋詩的特質為追憶詩定性；「吏隱」一章則會強調中國士大夫不同種類的隱以突出吏隱中「吏」字的特殊內涵。在清晰各主題的定義後，才會詳細分析該類詩歌的特色以及其反映詩人的精神面貌。

第六章為總結，通過深入討論韋應物詩歌的三大主題，總結出這一位一直被忽視或誤解的詩人的面貌。

第二章 韋應物的生平略述

第一節 韋應物的出身

韋應物傳記最早見於宋王欽臣(生卒年不詳)於嘉祐年間(1056)所校定的《韋蘇州集》〈集序〉簡傳。而新舊《唐書》均未爲韋應物立傳，故其生卒年份不詳，學者根據其詩推斷爲 737-793，稍後於李白(701-762)杜甫(712-770)，又較柳宗元(773-819)白居易(772-846)爲早。

雖然兩《唐書》未爲韋應物立傳，但經近世學者孫望、傅璇琮等考證，其生平事蹟基本已明。¹³ 韋應物爲京兆萬年縣人，¹⁴ 出於北周逍遙公韋夔之後，其高祖韋沖，隋戶部尚書，封義豐公。韋沖子韋挺，太宗時歷官吏部侍郎、黃門侍郎、御史大夫等職。韋挺子韋待價相武后，官吏部尚書。韋挺和韋待價雖先後都遭到貶死，但韋家子弟，名位高茂，一直是大族。可是從「家貧無舊業，薄宦各飄揚」¹⁵「況本濩落人，歸無置錫地」¹⁶可知，到了韋應物父親韋鑾這一代，韋家已相當蕭條了。

根據唐制，高品官員子孫中「少壯、肩膊齊、儀容整美者」可充任「三衛」，

---

¹³ 孫望：〈韋應物事迹考述〉（《南京師範學院學報》1962 年第一期）；傅璇琮：〈韋應物系年考證〉《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¹⁴ 韋應物傳記最早見於宋王欽臣嘉祐年間校定《韋蘇州集》中約三百幾十字的簡傳。之後將近一百年，姚寬(1105-1162)於《西溪叢語》進一步敘述其生平，至南宋紹興年間沈明遠(不詳)正式爲韋應物作了補傳。韋應物籍貫，姚以爲洛陽，沈明遠、辛文房以爲京兆長安。現在學者廖仲安〈韋應物繫年考證的幾件事〉以姚說無據，沈、辛說未確，考其爲京兆萬年人，所考甚詳。今從其說。

¹⁵ 〈發廣陵留上家兄兼寄上長沙〉，見《校注》，頁 85。

¹⁶ 〈答故人見諭〉，見《校注》，頁 350。

即親衛、勳衛、翊衛，每月輪番上直，擔任皇宮警衛及朝會、巡幸時的儀仗隊。雖然家道中落，但天寶八載(750)左右，韋應物仍能因門蔭關係，得補三衛，成為玄宗的御前侍衛，陪侍從遊宴。每年跟從玄宗和楊貴妃從長安到華清宮避寒。少年韋應物身騎廐馬，在儀衛隊伍中前驅；皇帝朝會萬國時，他便羽衛在側；冬狩春祠時隨從扈衛。朝廷無事，歡燕沐浴，他就常獲頒賜。

「御前侍衛」其實只是一個閒職，但一來當時韋應物年少力壯，二來天子近在咫尺，常沾恩露，故此，他不學無術，生活放縱，意氣洋洋，有不可一世之態。直至玄宗駕崩，他才折節讀書，約於 758-762 年間復入太學。

到代宗廣德二年(764)韋任洛陽丞之前，估計韋應物的重要經歷有二：一為與某女子結褵；二為復入太學讀書。韋詩有兩處與入讀太學有關，一是〈贈舊識〉：「少年遊太學，負氣蔑諸生。蹉跎三十載，今日海隅行」；¹⁷ 另一個是〈逢楊開府〉：「武皇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¹⁸ 歷來學者對應物入讀太學的時間眾說紛紜，經學者楊文惠整理之後，大致情況如下：韋應物第一次入讀太學為三衛時期，當時詩人雖附讀太學，但「少年遊太學，負氣蔑諸生」，無心用功。到他真正「折節讀書」乃是在安史亂後，肅宗乾元元年(758)至寶應元年(762)這幾年復入太學時候的事。¹⁹

正因為韋應物「流落失職」、「憔悴被人欺」，才可以造就「詩人韋應物」。復入太學後，韋應物才「把筆學題詩」。到代宗廣德元年(763)，韋應物開始出

---

¹⁷ 《校注》，頁 201。

¹⁸ 《校注》，頁 358。

¹⁹ 楊文惠：《韋應物詩研究》(台北：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2000)，頁 12-16。

仕。重新振作的詩人面對的卻是一個很不理想的現實，因此在職期間常想到退隱。但因為安史之後，現實生活實在艱難，要真正離職歸隱是不太可能的事。大抵韋應物亦因此從未真正歸隱。

第二節 詩人韋應物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有兩位韋應物，二人年代相差極近，自宋代的沈作喆(生卒年不詳)開始，已有人將二者混淆。紀昀(1725-1805)在《四庫全書》提要中，亦根據沈的意見而認為韋應物有「九十餘」歲。根據傅璇琮〈韋應物繫年考證〉，詩人韋應物約出生於開元二十五年(737)，曾任左司郎中和蘇州刺史，故世稱韋左司或韋蘇州。自蘇州刺史任上被罷官後，便寓居蘇州永定精舍，由於家貧，無法籌措回京路費，唯有租田督促子孫耕種自給。因為年事已高，視力衰退，不能再讀書寫字，亦無法再出仕了。而另一位韋應物的出現其實稍後於詩人韋應物，沈作喆根據劉禹錫於太和六年(832)為蘇州刺史時，舉韋應物自代職務一事(見劉禹錫〈為蘇州刺史舉官自代狀〉)，於是在〈補韋應物傳〉中寫道：「應物罷郡，寓于郡之永定佛寺。大和中，以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為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年九十餘矣，不知其所終。」根據韋詩〈燕李錄事〉中：「少年十五侍皇闈」，應物任三衛應在天寶中，當時才十五歲。若活至大和，應為九十餘歲，劉禹錫不可能推薦一個眼不清，走路也可能不穩的老人去當官。由於詩人韋應物閒居永定精舍後即再沒有詩文可考，故學者一般推斷他在罷蘇州後數年就離世，享年五十餘歲。本文要討論的是詩人韋應物，而不是曾被劉禹錫推薦、

與白居易同時代的韋應物。²⁰

第三節 韋應物的吏隱生活

廣德元年(763)至大曆元年(766)，詩人任洛陽丞。這個時期，詩人主要經歷了兩件事：一是真實感受到戰爭的殘酷，目擊洛陽的殘破，同時困守微官，對仕途沒有信心；二是詩人盡忠職守，卻因「撲捩(即鞭打)軍騎被訟」。後者促使詩人約於大曆元年(766)辭官養疾，寓居同德精舍數年，過着閑居生活。數年後，約於大曆七年(773)冬離開洛陽返回長安，途經驪山，憶起開元天寶(下稱「開天」)盛事。

約在大曆九年(775)，詩人初任京兆功曹。此前，韋應物有梁州、淮海之行。後來詩人被黎幹推薦擔任京兆府功曹，府內事務繁忙，詩人須常到屬縣出使。期間就曾出使藍田、雲陽等屬縣，親身體驗人們生活苦況。大曆十三年(779)轉任鄠縣令，翌年黎幹因曾參與廢立太子事，於德宗繼位後不久即被除名長流，賜死藍田。是年六月，韋應物自鄠縣令除櫟陽令，以疾辭歸善福精舍。與他同甘共苦的髮妻於同年前後亡故。這段時間，詩人創作甚豐，詩集中題為「善福閣」、「善福精舍」或「灋上」的作品有助我們了解這一時期詩人的生活。

建中二年(782)至建中三年(783)，韋應物除尚書比部員外郎，須處理的事物頗繁雜，勞形傷神，令詩人十分懷念灋上幽居生活。建中四年(783)轉任滁州。

---

²⁰ 周允中：〈兩個韋應物的一場疑案〉《文苑漫步》1999年第5期。頁49。

自德宗建中四年(784)至貞元六年(791)，韋應物三爲州刺史，歷任滁州、江州和蘇州刺史，罷蘇州之後，寓居蘇州永定精舍，王欽臣《韋蘇州集序》云：「貞元初，又歷蘇州。罷守，寓居永定精舍，其後事跡，究尋無所見。」²¹ 後世學者因此推論韋應物罷蘇州後不久辭世。

---

²¹ 《校注》附錄，頁 625。

第三章 興諷詩

第一節 興諷詩釋義

前人論韋應物其人時，往往受李肇《國史補》「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至焚香掃地而坐」影響，²² 首先想到的是一位高士的形象，以至有些學者對韋應物在〈逢楊開府〉中的自白表示懷疑；²³ 而論其詩亦多側重於其描寫山水、風格閑淡之作，將他與陶淵明、王維、孟浩然、柳宗元相提並論。無可否認，韋應物風格淡雅的作品藝術價值很高，但這並非韋詩的全部。若只論這一類作品，對要全面了解詩人必有所失。事實上，在五百多首韋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類型的作品，包括興諷詩。

安史之亂和藩鎮割據令唐代人民長期陷於苦難之中。面對朝政腐敗、外患連綿的這樣一個時代，詩風以平淡見稱的韋應物也有激越、憤慨的作品。如從文學史慣性的分期來推測，有些人或會以為韋應物在初任官時充滿入世精神，²⁴ 故寫作興諷詩，在晚年久遭戰亂和沉淪下僚，人生觀變得消極，遂多自然閑適之作，風格也趨向平淡。然而，綜觀韋應物的一生經歷及其詩流露的思想情感，詩人至暮年任蘇州刺史仍體恤百姓的艱苦，一直以造福人民為己任，並非只在年輕時候表現積極入世的精神，而晚年歸向淡泊平靜的生活。唐人白居易(772—

---

²² 唐李肇：《國史補》《筆記小說大觀》(台北：新興書局，1962)，卷下，頁4。

²³ 清賀裳宋人韓駒云：「余觀其為人，賦性高潔，所居焚香掃地而坐，與豪縱者不類。」《載酒園詩話》卷1，見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251。

²⁴ 儲仲君認為韋應物「前期詩歌明朗的基調和批判的鋒芒」，見〈韋應物詩分期的探討〉《文學遺產》(1984年4期，12月)，頁67。

846) 對韋應物已有較全面的評論，他在〈與元九書〉中除了指出「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也說：「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²⁵ 清人喬億(1702-1788)《劍谿說詩又編》亦云：「韋公多恤人之意，極近元次山。」²⁶ 他們都注意到韋應物的作品中有不少篇什是針對當時社會政治民生而寫的。

白居易指出韋應物詩「頗近興諷」。「諷」指政治上的諷諭，而「興」則是一種藝術表現手法；古人認為「諷」須用「興」來表達，所以統稱為「興諷」。「興」本為《詩經》「六義」之一，漢儒認為是「託事於物」的一種表現手法，用來指陳政治的得失善惡。²⁷ 西晉的摯虞(?—311)說：「興者，有感之辭也」²⁸，強調了「興」的感情生發作用，比較偏向藝術方面來解說。到了唐代，陳子昂(約659—700)在〈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批評齊梁間作品「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²⁹ 「所謂興寄，即要求作品中寄託作者深沉充實的感慨。」³⁰ 陳子昂在〈修竹篇〉中即以龍種的修竹起興，比喻志士的堅貞，並以尋仙作結。元結(719—772)身經安史之亂，論詩主張救時勸俗和規諷的作用，他的詩作以諷諭現實著

²⁵ 白居易於元和十年(815)十二月於江州寫了一封長信給元稹，談自己的文學主張，這就是著名的〈與元九書〉。

²⁶ [清]喬億：《劍谿說詩》卷上，見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1121。

²⁷ 《周禮·春官》鄭眾注：「比者，比方于物也。興者，託事於物也。」鄭玄注：「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

²⁸ 郁沅、張明高編選：《魏晉南北朝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頁179。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西晉人。其《文章流別集》三十卷乃分類編集古代文章之作，附有評論，稱《文章流別論》。書已散佚，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七十七，輯錄《文章流別論》若干條。

²⁹ 全文如下：「東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於解三處，見明公詠孤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復睹於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解君云：張茂先、何敬祖、東方生與其比肩，僕亦以為知言也。故感歎雅製，作〈修竹〉詩一首，當有知音以傳示之。」見彭慶生注釋：《陳子昂詩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頁218。

³⁰ 王運熙、顧易生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頁181。

名，例如〈春陵行〉、〈賊退示官吏〉兩詩，杜甫稱為「比興體製，微婉頓挫之詞」³¹。不過，〈春陵行〉、〈賊退示官吏〉寫人民遭到官府徵斂之繁酷，備受催逼之痛苦，詞直氣憤，意思直截了當，略無藻繪，不能算是比興微婉。例如，〈春陵行〉一開首便說：「軍國多所需，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競欲施。供給豈不憂，征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³² 它直述當時的社會問題，沒有觸物起興，也沒有托物喻志，不符合《詩經》以來所謂「比則蓄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托諷」³³ 的比興精神。白居易編集自己的詩歌時，將自己的詩分成諷諭、閑適、感傷和雜律四類。在〈與元九書〉中，他為諷諭下了這樣的定義：「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³⁴ 我們拿他的〈新樂府〉如〈賣炭翁〉、〈新豐折臂翁〉等詩來考察，就可以發現他重視作品反映國事民生，美刺政治得失，多於是否運用了「比興」的手法。綜合以上各家觀點，可見唐人對「興」的看法係從「美刺」、「有感」申發，強調作者對現實有深沉充實的感慨，而不局限於「託事於物」的手法。而所謂「興諷詩」，是對時事有感而發，於詩中表達出深沉的感慨，最後希望發生美刺作用的作品。

白居易舉杜甫稱得上「風雅比興」的作品是〈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以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類的詞句，他稱讚韋應物「頗近興諷」的歌行自然也就是指這一類。但事實上，韋詩中「對時事有感而發，於詩中表達出深沉的感慨，最後希望發生美刺作用的作品」不只是歌行，其他諸如〈雜體〉詩、〈擬古詩〉及其他一些作品也都含有諷喻的主題。白居易只提及歌行，是舉其大要而已，亦為自己的「新樂府」張本。

---

³¹ 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1691。

³²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2704。

³³ 劉勰《文心雕龍·比興》，見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394。

³⁴ 同註5。

興諷詩是特殊歷史背景及個人際遇下的產物，故在下面的討論中，當會與當時的歷史背景、詩人的個人際遇互相闡發；而本章亦有助我們了解詩人其他種類的詩作，讓我們更立體、更全面地認識韋應物。

第二節 興諷詩的探討

韋應物的興諷詩按其內容，大致可分成幾個類別：一是批評統治者治國之策；二是揭露藩鎮專橫；三是諷刺權貴生活侈靡，狼狽爲奸；四是同情弱小老百姓等，其中蘊含自己直道難行而又守拙不屈的高尚情操。

在討論韋應物的興諷詩之前，我們須對詩人當時面對的環境有一初步了解。安祿山在天寶十四年(757)十一月於范陽作亂。十二月已連陷陳留、荊陽、洛陽等地，一個月內即佔領今河北、山西、河南大部份地區。由於海內昇平日久，府兵頹廢，叛軍所至，州縣望風瓦解。君臣上下倉皇失措，一時之間竟無人能鎮靜應敵。是年底，哥舒翰守潼關，郭子儀、李光弼、僕固懷恩在振武破敵，顏真卿兄弟策動河北諸郡起兵討賊，這才稍振群情，奮力抗戰。可惜，隨着翌年六月潼關失守，長安淪陷，玄宗奔蜀，肅宗即位靈武，唐與安史亂兵開始了長達八年的艱苦戰爭。儘管一年後就收復長安，二帝還京，安史自相殘殺，但形勢始終未見輕鬆。九節度兵敗河陽，東都得而復失，李晟敗績北邙山，都使局面變得危急。除了淮河以北的中原平叛戰爭之外，南方還有永王東巡、劉展亂江淮、康楚元據襄州、段子璋陷綿州、徐知道反成都及浙東袁晁農民起義

等規模大小不一的戰爭，西北黨項、吐蕃也乘機入侵，掠奪邊州。環顧四海，兵戎無定，哀鴻遍野，生靈塗炭。

洛陽原於天寶十四載冬為安史叛軍攻陷，後於肅宗至德二載(757)十月為郭子儀率領的唐軍收復。但由於肅宗朝廷的腐敗無能，導致乾元二年(759)九節度的相州之潰，嗣後洛陽又陷於史朝義的軍隊。肅宗寶應元年(762)十月，唐朝廷荒謬地請求回紇軍隊的幫助，並許下「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的諾言。³⁵ 經過力戰，洛陽終於再次被收復，而這支「王師」也實踐肅宗的承諾，趁火打劫，令洛陽遭到極大的破壞，幾乎變成一座廢城。

寶應二年(763)七月，改元廣德元年(763)，就在這一年，韋應物首次出仕，從長安赴洛，任洛陽丞，負責撫緝遺民。面對洛京這樣殘破的情況，詩人「有感而發」，寫下〈廣德中洛陽作〉：

「生長太平日，不知太平歡。今還洛陽中，感此方苦酸。

飲藥本攻病，毒腸翻自殘。王師涉河洛，玉石俱不完。

時節屢遷斥，山河長鬱盤。蕭條孤煙絕，日入空城寒。

蹇劣乏高步，緝遺守微官。西懷咸陽道，躑躅心不安。」³⁶

詩人以往昔的太平歡樂映襯洛陽的戰亂艱苦。接下來便把矛頭指向朝廷引狼入室的國策，以回紇兵平亂，無疑是飲鴆止渴，結果是「毒腸翻自殘」，雖然洛陽能被收復，但「王師」所到之處，窮凶極惡，四處殘害掠奪，「玉石俱不完」。詩人觸目所及，「蕭條孤煙絕，日入空城寒」，洛陽變成廢墟死城。詩人一方面

---

³⁵ 《資治通鑑》卷 220。

³⁶ 《校注》，頁 419。

感到激憤，一方面想到自己官職卑微，緝遺的工作不易為。

韋應物在〈經函谷關〉中一再批評朝廷用人失當：

「洪河絕山根，單軌出其側。萬古為要樞，往來何時息。

秦皇即恃險，海內被吞食。及嗣同覆顛，咽喉莫能塞。

炎靈詎西駕，婁子非經國。徒欲扼諸侯，不知恢至德。

聖朝及天寶，豺虎起東北。下沈戰死魂，上結窮冤色。

古今雖共守，成敗良可識。藩屏無俊賢，金湯獨何力。

馳車一登眺，感慨中自側。」³⁷

詩歌首先描寫有金湯之固的函谷關何其雄峻險要，然後借秦朝倚恃天險而終致敗亡及婁敬說漢高祖都咸陽兩史事，傷當世事，慨嘆西京輕易失守，引出「古今雖共守，成敗良可識。藩屏無俊賢，金湯獨何力」的議論。潼關一帶雖有河山之固，但監軍邊令以私怨奏殺守將封常清、高仙芝，宰相楊國忠又以私怨逼使抱病的哥舒翰棄守出戰，終致慘敗。詩人嚴肅地指出，關塞險固是不足恃的，若守將任人不當，最終仍會釀成大亂，結果給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喬億評此詩謂：「議論正大，可為經國至言。」³⁸

另一方面，詩人在〈睢陽感懷〉中熱烈謳歌在安史之亂中，堅守睢陽孤城，被圍經年，直至城中糧盡被陷，仍不棄城逃去，寧願從容就義的張巡、許遠：

---

³⁷ 《校注》，頁 382。

³⁸ 喬億：《劍溪說詩》又編，見《校注》，頁 383。

同時亦怒斥那些見死不救，擁兵自重的藩鎮。詩人以張巡等守將「甘從鋒刃斃，莫奪堅貞志」的英勇對比貪生怕死，「降賊庭」的「宿將」。³⁹

再看〈漢武帝雜歌〉三首，詩歌表面上寫漢武帝，實際上諷刺唐朝君主耽於道教迷信、不理朝政。《資治通鑑》記載肅宗信任「專依鬼神以求媚」的王璦，分遣女巫祈天下名山大川；⁴⁰ 代宗時，「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⁴¹ 詩歌把漢武帝寫得帶有神話色彩的威武剛強，但這些鋪陳是爲了突顯後面的議論，詩人質疑當朝處理危機的能力：「何爲臨深親射蛟，示威以奪諸侯魄。威可畏，皇可尊。平田校獵書猶陳，此日從臣何不言。獨有威聲振千古，君不見後嗣尊爲武。」⁴²

唐自安史亂後，藩鎮專橫暴戾，不聽中央政府之命，是另一嚴重的社會禍患。建中二年(781)至三年(782)，四十五歲的韋應物除(即升任)尚書比部員外郎，建中三年(782)夏出爲滁州刺史。時諸淮西節度使李希烈遣兵四出抄掠，洛陽大擾。唐室派涇原等鎮之兵討之。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率兵五千到京，因未得到賞賜，士卒鼓譟譁變，入京搶掠。德宗倉皇出奔奉天。亂兵奉原涇原節度使朱泚爲帥。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自將兵進攻奉天，最後於興元元年(784)爲渾瑊、李晟等討平。七月，德宗歸長安。〈京師叛亂寄諸弟〉⁴³和〈寄諸弟〉⁴⁴

---

³⁹ 原詩如下：「豺虎犯天綱，昇平無內備。長驅陰山卒，略踐三河地。張侯本忠烈，濟世有深智。堅壁梁宋間，遠籌吳楚利。窮年方絕輸，鄰援皆攜貳。使者哭其庭，救兵終不至。重圍雖可越，藩翰諒難棄。饑喉待危巢，懸命中路墜。甘從鋒刃斃，莫奪堅貞志。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空城唯白骨，同往無賤貴。哀哉豈獨今，千載當歎歎。」，見《校注》，頁 416。

⁴⁰ 《資治通鑑》卷 220。

⁴¹ 《資治通鑑》卷 224。

⁴² 見《校注》，頁 416。

⁴³ 《校注》，頁 168。

⁴⁴ 《校注》，頁 171。

所紀的就是這件事。

韋應物有一類興諷詩運用比興，取譬禽鳥，生動地鞭笞豪強權貴的暴行。

如〈烏引雛〉

「日出照東城，春烏鴉鴉雛和鳴。雛和鳴，羽猶短。巢在深林春正寒，
引飛欲集東城暖。群雛離襁睥睨高，舉翅不及墜蓬蒿。雄雌來去飛又
引，音聲上下懼鷹隼。引雛烏，爾心急急將何如。何得比日搜索雀卵
啖爾雛。」⁴⁵

春烏照顧自己的幼鳥無微不至，傳統中常被譽為孝鳥。可惜春烏卻是日日搜索其他雀鳥的卵以餵其雛，這種損人利己的行為，令詩人非常反感。又如〈鳶奪巢〉

「野鵲野鵲巢林梢，鴟鵂恃力奪鵲巢。吞鵲之肝啄鵲腦，竊食偷居常自
保。鳳凰五色百鳥尊，知鳶為害何不言？霜鷗野鷗得殘肉，同啄膾腥
不肯逐。可憐百鳥紛縱橫，雖有深林何處宿。」⁴⁶

詩人恨透了「恃力奪鵲巢」「吞鵲之肝啄鵲腦，竊食偷居常自保」的鴟鵂；另一方面，詩人對姑息這些無良份子的百鳥之尊「鳳凰」也很不滿。最後詩人對飽受欺凌的百鳥寄予無限同情，慨嘆「可憐百鳥紛縱橫，雖有深林何處宿」。詩人不只一次批評朝廷姑息養奸的政策，〈雜體五首〉其二亦有相似主題：

「古宅集妖鳥，群號枯樹枝。黃昏窺人室，鬼物相與期。居人不安寢，
搏擊思此時。豈無鷹與鷂，飽肉不肯飛。既乖逐鳥節，空養凌雲姿。

---

⁴⁵ 《校注》，頁 550。

⁴⁶ 《校注》，頁 551。

孤負肉食恩，何異城上鷗。」⁴⁷

整首詩的寓意很清楚。詩人將唐王室比喻為一座「古宅」，以祆鳥(怪鳥、惡鳥)借喻跋扈的藩鎮與外族。這些祆鳥在「枯樹枝」上「群號」，時時伺機侵襲，喻朝內小人當道，類似鬼物，為虎作倀。詩人又以鷹、鷂猛禽飽肉不肯飛喻受朝廷俸祿的人，貪得無厭，同時又未能在需要時發揮作用，辜負朝廷恩惠。詩人狠批他們如食腐肉的鷂鷹。

建中四年(783)秋冬，詩人寫給暢當的一首詩中，寫道「丈夫當為國，破敵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鬢毛班」；⁴⁸ 建中末、興元中〈始建射侯〉云：「男子本懸弧，有志在四方」「一朝願投筆，世難激中腸」⁴⁹ 都表現出在國家危難之，願投筆從戎的激情。從以上的討論可見，詩人關心國家、人民，希望為國貢獻，積極用世實是韋應物生命的基調。

這大抵與詩人特殊的人生經歷有關。不同於一般自小讀書以求仕的詩人，韋應物是在大亂後痛定思痛，才折節讀書的。既決心走另一條人生路，希望為國家貢獻，為人民謀福祉，即使現實困難，又豈會輕易放棄？韋應物一再於詩中表露為官的責任心和立場，有時甚至為自己不能令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而慚愧，例如〈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⁵⁰、〈新秋夜寄諸弟〉「方用憂人瘼，況自抱微疴」⁵¹、〈答崔都水〉「忙稅況重疊，公門極熬煎。

---

⁴⁷ 《校注》，頁 26。

⁴⁸ 〈寄暢當〉詩題原注：「聞以子弟被召從軍。」，見《校注》，頁 163-164。

⁴⁹ 「射侯」為古射禮所用的射布，即箭靶。由於連年戰亂，時勢所逼，故州郡講武習射，設射侯，以應不時之需。見《校注》，頁 538-539。

⁵⁰ 《校注》，頁 55。

⁵¹ 《校注》，頁 146。

責逋甘首免，歲宴當歸田」⁵²、〈襄武館游眺〉「仰恩慚政拙，念勞喜歲收」⁵³、〈游瑯琊山寺〉「物類誠可遣，疲眊終未忘」⁵⁴、〈答暢校書當〉「出入與民伍，作事靡不同」⁵⁵以及著名的〈寄李儋元錫〉「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⁵⁶。

而在現實中，詩人亦身體力行，例如大曆十二年(778)夏秋，秦中大水成災，韋應物出使雲陽視察災情，有詩〈使雲陽寄府曹〉記其事。從首四句可見韋應物並非坐在官邸中空言關心民瘼的詩人，他早起駕車，頂着烈日，走過百里，沿途「周旋涉塗潦，側峭緣溝脈」來到災難現場，慰問災民。雖曰受命，但也見詩人對災情及災民的關心。⁵⁷在〈發蒲塘驛沿路見泉谷村墅忽想京師舊居追懷昔年〉中亦有「均徭視屬城，問疾躬里閭」之句。⁵⁸

可惜，朝廷並未珍惜這樣一個盡心爲民的官員，反而讓他在仕途上一再遇到挫折。永泰年間(約 765-766)，疾惡如仇的詩人撲扶目無法紀的軍騎，最後反而被訟。王欽臣、姚寬未載其事。沈作喆補傳謂：「永泰中，遷洛陽丞。兩軍騎士倚中貴人勢，驕橫爲民害，應物疾之，痛繩以法，被訟，弗爲屈。」⁵⁹詩人在〈示從子河南尉班并序〉直接提及這件事

「(永泰中，余任洛陽丞，以撲扶軍騎，時從子河南尉班，亦以剛直爲政，俱見訟於居

---

⁵² 《校注》，頁 327。

⁵³ 《校注》，頁 458。

⁵⁴ 《校注》，頁 472。

⁵⁵ 《校注》，頁 320。

⁵⁶ 《校注》，頁 166。

⁵⁷ 《校注》，頁 98。

⁵⁸ 《校注》，頁 380。

⁵⁹ 沈作喆：《補韋應物傳》，見《校注》附錄二，頁 619。

⁶⁰ 《校注》，頁 70。

守。因詩示意，府縣好我者，豈曠斯文。)

拙直余恆守，公方爾所存。同占朱鳥剋，俱起小人言。

立政思懸棒，謀身類觸藩。不能林下去，祇戀府庭恩。」⁶⁰

詩中揭露了直道難行是所有盡忠職守的官員共同面對的困境，詩人與其姪韋班都因為公正不阿而遇到麻煩，可見，隨了最高統治者治國無道之外，地方政治也是非不分。「立政思懸棒，謀身類觸藩」指斥當局腐敗，令奉公守法的官員陷入左右為難的窘境，簡直如「羝羊觸藩」。大曆二年(767)初春，詩人藉病請告，退居同德精舍養疾。詩人的怒氣反映於〈任洛陽丞請告一首〉。⁶¹但詩人始終關心民瘼，儲仲君亦指出，寓居同德寺「只是從糾紛中體面地撤出的一個辦法」，⁶²陳友琴認為「他的熱情深蘊在骨子裏」⁶³。

韋應物所任的官職職位不高，但他仍積極地做些有益民生的事。在〈登高望洛陽城作〉，詩人一方面慨嘆京城破壞的嚴重，一方見到殘破的洛陽稍為有點恢復，「平明四城開，稍見市井喧」，不禁將經世濟民作為自己長期的責任「永懷經濟言」。⁶⁴經過一番「緝遺」之後，洛陽基本恢復了，詩人登同德寺閣眺望，寫下〈同德寺閣集眺〉，描述洛陽新貌「舟車滿川陸，四國靡不通。舊堵今已葺，庶甿亦已豐」，詩人喜形於色，「周覽思自奮，行當遇時邕。」⁶⁵對於荒年逃難的人民，韋應物最想做的，只是撫恤孤兒寡婦而已：〈逢楊開府〉「出守無惻嫠」

⁶¹ 原詩如下：「方鑿不受圓，直木不為輪。揆材各有用，反性生苦辛。折腰非吾事，飲水非吾貧。休告臥空館，養病絕羣塵。遊魚自成族，野鳥亦有群。家園杜陵下，千歲心氛氲。天晴嵩山高，雪後河洛春。喬木猶未芳，百草日已新。著書復何為，當去東皋耘。」(見《校注》，頁491。)現實實在令詩人太失望，詩人以「方鑿」「直木」自喻，無法「反性」「折腰」。詩人孤高離群，安貧樂道，在詩中表現出自己對官場的厭倦，欲學陶淵明離開官場歸隱去。

⁶² 儲仲君：〈韋應物詩分期的探討〉《文學遺產》(1984年4期，12月)，頁68。

⁶³ 陳友琴：〈讀《韋蘇州集》札記〉《溫故集》(上海：中華書局，1964)，頁140。

⁶⁴ 《校注》，頁423。

⁶⁵ 《校注》，頁425。

⁶⁶、〈始至郡〉「豈待干戈戢，且願撫惇嫠」⁶⁷。有學者認為「韋應物晚年仕途開始通達，江州是重鎮，蘇州是上州，作為一個大州刺史的榮耀、地位和寬綽的生活，已經使政治上並無多大野心的韋應物感到了滿足…….儘管他有時還說：『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之類的說，給人的印象卻頗像是套話。』⁶⁸ 學者姜光斗、顧況卻指出韋應物的確有感於蘇州的繁華，而曾經想幹一番事業，要在這個大都市「省畛俗」「勸農桑」，做一些有利於民的事。⁶⁹ 有學者指出詩人刺蘇州前期，曾訓誡下屬必須「矜老疾，活艱困」，凡貧民拖欠的賦稅，命令「鄉計之而白于縣，縣審之而上于郡」，然後由刺史根據實情予以蠲免。⁷⁰在歲末冬宴時看到「戎士氣益振」，即高興地勉勵部下要以積極的態度報答皇恩：「顧謂軍中士，仰答何由申？」⁷¹ 自己也致力公務而暫時擱下詩歌創作：「大藩本多事，日與文章疏」。⁷² 努力之下，稍見收穫，詩人與民共享這份喜悅：「宴集觀農暇，笙歌聽訟餘」。⁷³ 可惜後來受到許多麻煩阻撓，令他無法搞好政務。詩人罷蘇州刺史後，寓居永定精舍，當了大半生地方官，結果兩袖清風，景況淒涼，竟窮得連回故鄉京兆萬年縣的盤纏也沒有。⁷⁴

由此可見，韋應物並非如一些學者所指，早期積極用世，晚年激情減退，

---

⁶⁶ 《校注》，頁 358。

⁶⁷ 《校注》，頁 500。

⁶⁸ 儲仲君：〈韋應物詩分期的探討〉《文學遺產》（1984 年 4 期，12 月），頁 75。

⁶⁹ 見〈登重玄寺閣〉，《校注》，頁 433。

⁷⁰ 姜光斗、顧啓〈韋應物任蘇州刺史時的建樹和晚年概況〉《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 年第 4 期）。

⁷¹ 〈軍中冬燕〉，見《校注》，頁 59。

⁷² 〈贈丘員外〉其一，見《校注》，頁 195。

⁷³ 〈酬閭員外陟〉，見《校注》，頁 352。

⁷⁴ 〈寓居永定精舍〉：「政拙欣罷守，閒居初理生。家貧何由往，夢想在京城。野寺霜露月，農興羈旅情。聊租二頃田，方課子弟耕。眼暗文字廢，身閒道心精。即與人群遠，豈謂是非嬰。」，見《校注》，頁 505。

轉向歸隱，更不曾坐重鎮以自肥。詩人一生都關心國家，雖然大部份時間身居微職，工作不順利，出仕期間又常遇阻制，但仍不改其本色，常借寫作興諷詩抒發心中激情。韋應物的興諷詩除上述〈廣德中洛陽作〉、〈經函谷關〉等批評國策失當外，還常借古諷今，諷刺皇族權貴的生活奢華靡爛。例如〈金谷園歌〉

「石氏滅，金谷園中水流絕。當時豪右爭驕侈，錦爲步障四十里。東風吹花雪滿川，紫氣凝閣朝景妍。洛陽陌上人回首，絲竹飄飄入青天。晉武平吳恣歡燕，餘風靡靡朝廷變。嗣世衰微誰肯憂，二十四友日日空追遊。追遊詎可足，共惜年華促。禍端一發埋恨長，百草無情春自綠。」⁷⁵

詩歌一開始即寫今天石崇滅亡、金谷園水流絕，先聲奪人。石崇是晉初功臣石苞之子，官至散騎常侍、侍中。據《晉書·石崇傳》記載，石崇有妓綠珠美艷，孫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崇亦與潘岳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乃矯詔收崇、岳等，殺之。崇初被收，以爲不過流放交、廣，及將行刑，方悟已因家財而致禍。詩人借石崇的事告誡朝中貴權，生活奢靡必將自取滅亡。

唐代有些人趁亂起家，當國家仍處於危難之中，他們卻過着奢靡的生活。諫官獨孤及曾於永泰元年(765)三月上疏云：「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于杼軸。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⁷⁶對於一些權貴，詩人亦有興諷詩撻伐之，例如〈長安道〉

「漢家宮殿含雲烟，兩宮十里相連延。晨霞出沒弄丹闕，春雨依微自甘泉。春雨依微春尚早，長安貴遊愛芳草。寶馬橫來下建章，香車卻轉避馳道。貴

---

⁷⁵ 《校注》，頁 555。

⁷⁶ 《資治通鑑》卷 223。

遊誰最貴？衛霍世難比。何能蒙主恩？幸遇邊塵起。歸來甲第拱皇居，朱門峨峨臨九衢。中有流蘇合歡之寶帳，一百二十鳳凰羅列含明珠。下有錦鋪翠被之粲爛，博山吐香五雲散。麗人綺閣情飄飄，頭上鴛鴦雙翠翹。低鬟曳袖回春雪，聚黛一聲愁碧霄。山珍海錯棄藩籬，烹犢炰羔如折葵。既請列侯封部曲，還將金印授盧兒。歡榮若此何所苦，但苦白日西南馳。」⁷⁷

詩歌借漢武帝時衛青、霍去病兩貴權事以諷今。衛青爲衛皇后弟，霍去病爲衛青姊子，以貴戚及屢破匈奴建功，均封列侯。衛青官至大將軍，霍去病爲剽姚校尉、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貴盛無比。這些權貴住的是「甲第」「朱門」，「中有流蘇合歡之寶帳，一百二十鳳凰羅列含明珠」；吃的是「山珍海錯棄藩籬，烹犢炰羔如折葵」，而且不止一家榮華富貴享受如此，還能蔭庇屬下「既請列侯封部曲，還將金印授盧兒」。「何能蒙主恩？幸遇邊塵起。」「歡榮若此何所苦，但苦白日西南馳。」詩人極不屑於這些新貴們。

除了飛黃騰達的新貴，唐代的外戚是另一批社會的蛀蟲，〈貴遊行〉就是針對他們而寫的

「漢帝外家子，恩澤少封侯。垂楊拂白馬，曉日上青樓。

上有顏如玉，高情世無儔。輕裾含碧烟，窈窕似雲浮。

良時無還景，促節爲我謳。忽聞豔陽曲，四坐亦已柔。

賓友仰稱嘆，一生何所求。平明擊鍾食，入夜樂未休。

風雨愆歲候，兵戈橫九州。焉知坐上客，草草心所憂。」⁷⁸

〈長安道〉中的新貴尙且靠戰功而封侯，〈貴遊行〉中的這些「外家子」憑的是

---

⁷⁷ 《校注》，頁 540。

⁷⁸ 《校注》，頁 546。

什麼呢？他們靠的是外戚的關係，無功而受恩寵。這些人在兵荒馬亂的時候仍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風雨愆歲候，兵戎橫九州。焉知坐上客，草草心所憂」，何其可悲。

韋應物一生過着出仕和半隱的生活，每到仕途艱難處，往往隱居佛寺暫時「撤出」（儲仲君語）。但這並不表示詩人就此過着焚香掃地，不問世事的隱士生活。例如在同德精舍閒居數年後，韋應物於大曆七年（772）離開洛陽返回長安。其後到梁州、淮海遊歷。在這段期間，詩人仍表現出對社會民生的關注，特別表示對社會上受剝削的弱小表示同情。例如於大曆八年（773）冬淮海客遊期間在廣陵寫下的〈鼙鼓行〉

「淮海生雲暮慘澹，廣陵城頭鼙鼓暗。寒聲坎坎風動邊，忽似孤城萬里絕。四望無人烟，又如虜騎截遼水，胡馬不食仰朔天。座中亦有燕趙士，聞鼙不語客心死。何況鰥孤火絕無晨炊，獨婦夜泣官有期。」⁷⁹

戰火之下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無數家庭因戰亂而被破壞：「何況鰥孤火絕無晨炊，獨婦夜泣官有期」。近藤元粹評此詩曰：「形容慘澹（淡）殺氣，全湧于紙上矣。」又曰：「主旨在末解。」⁸⁰

老百姓除飽受戰爭折磨外，也要為滿足皇族權貴的糜爛生活而受壓逼。大曆九年（774）四年至十四年（779），韋應物應黎幹之薦再次出仕，出任京兆府功曹。期間須到屬縣出使，韋應物因此曾到藍田、雲陽等屬縣出使，親眼目睹百姓苦況。難過之餘不忘寫詩記之，例如〈采玉行〉便是大曆十年（775）出使藍田

---

⁷⁹ 《校注》，頁 553。

⁸⁰ 見孫望：《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74。

時作

「官府徵白丁，言采藍溪玉。絕嶺夜無家，深榛雨中宿。獨婦餉糧還，
哀哀舍南哭。」⁸¹

藍田縣以出美玉著名，詩中寫玉工「絕嶺夜無家，深榛雨中宿」慘狀，雖然沒有直接在詩中流露個人感情，然而詩中玉工的慘痛形象已能觸發讀者的同情心。這些玉工這麼辛苦地採玉，目的就是為了滿足統治權貴們的慾望。沈德潛評此詩謂：「苦語，卻以簡出之。」⁸²〈夏冰歌〉也表現了同樣的主題

「出自玄泉杳杳之深井，汲在朱明赫赫之炎辰。九天含露未銷鑠，閭闔初
開賜貴人。碎如墜瓊方截璐，粉壁生寒象筵布。玉壺紈扇亦玲瓏，座有
麗人色俱素。咫尺炎涼變四時，出門焦灼君詎知。肥羊甘醴心悶悶，飲
此瑩然何所思。當念闌干鑿者苦，臘月深井汗如雨。」⁸³

詩歌以夏冰得之不易對比貴人們在筵席上享用的情況，詩人諷刺道：「咫尺炎涼變四時，出門焦灼君詎知」，一方面批評「閭闔初開賜貴人」的統治者，一方面對「臘月深井汗如雨」的鑿工深表同情。再看〈雜體〉五首其三

「春羅雙鴛鴦，出自寒夜女。心精煙霧色，指歷千萬緒。長安貴豪家，妖
豔不可數。裁此百日功，唯將一朝舞。舞罷復裁新，豈思勞者苦。」⁸⁴

詩人以「寒衣女」「指歷千萬緒」的「百日功」與「長安貴豪家」「妖艷」的「一朝舞」作強烈對比，批判長安權貴生活奢華，未懂珍惜勞動者的苦辛。唐代賦役中有租、庸、調，調即徵收綾、絹、絁、布等，另隨地所出，徵收綾、錦等貢品。因此，當時的人民除飽受戰火煎熬外，無論男女都受到苛稅的催逼。

---

⁸¹ 《校注》，頁 593。

⁸² 沈德潛：《唐詩別裁》卷三，見《校注》，頁 594。

⁸³ 《校注》，頁 590。

⁸⁴ 《校注》，頁 27。

杜甫也在〈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提到「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⁸⁵，而白居易的〈繚綾〉（念女工之勞也）⁸⁶、王建的〈織婦曲〉和元稹的〈織婦詞〉都從相近的角度表達對織婦的同情。

三首詩歌都是先將人民的苦況用白描的手法陳展在讀者眼前，讓讀者自己去感受其坎坷，自己產生同情之感。然後運用了「卒章顯志」的手法，於篇末才能帶出詩歌的旨意。

詩人雖然同情人民，很想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但從詩人在大曆十二年(778)所寫的〈高陵書情寄原盧少府〉一詩中可知這些好官所面對的困境

「直方難爲進，守此微賤班。開卷不及顧，沉埋案牘間。兵凶久相踐，
賦徭豈得閑。促戚下可哀，寬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門望故山。
君心儻如此，攜手相與還。」⁸⁷

自安史之亂以還，兵革相繼，未嘗或寧。就大曆十年前後而言，如九年二月，徐州軍亂；十年正月，田承嗣引兵襲取相州；二月據相衛四州地；三月，陝州軍亂；田承嗣之亂，官兵圍討竟歲……這就是詩中「兵凶互相踐」。詩人基於本身質直，致力爲人民謀福祉，卻難有作爲，長期沉淪下僚，不但不能有任何作爲，終日要處理繁重的公務，「寬政身致患」更寫出了詩人一類愛民官員的無奈：若對平民寬仁，便會爲自己帶來禍患。因此詩末也流露出對官場的厭倦，萌生退隱的念頭。

---

⁸⁵ 杜甫著、(清)仇兆鰲注、秦亮點校：《杜甫全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6），頁 227。

⁸⁶ 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 225。

⁸⁷ 《校注》，頁 66。

大曆十四年(780)五月，「仁賢」黎幹因牽涉皇位爭奪的鬥爭，觸犯德宗，因此於德宗繼位後不久即被除名長流，最後賜死藍田。同時期韋應物妻子亡故，詩人心灰意冷，以疾辭退櫟陽令，⁸⁸ 閑居善福精舍。⁸⁹ 這段時期詩人作品很多，種類亦繁多，其中仍不乏關注國家社會民生的諷諭之作。〈觀田家〉就是這時期的作品

「微雨眾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起。丁壯俱在野，
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饑飬不自苦，膏澤且爲喜。
倉廩無宿儲，徭役猶未已。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里。」⁹⁰

詩寫於灋上閑居時，詩人看到辛勤耕種的農夫在田裏工作的情形，欣賞他們刻苦耐勞，知足常樂，「飢飬不自苦，膏澤且爲喜」，同情他們「倉廩無宿儲，徭役猶未已」，對自己不耕而食感到慚愧。詩人對於自己不耕而食感到慚愧。由此可見，詩人心裏仍有強烈社會責任。

第三節 小結

韋應物傳世五百多首詩作，無論其內容或所呈現的風格都是多樣的，我們不應籠統地以一個概念如「平淡」來概括。前代詩評家大多只談其描摹山水、自然景物之詩，這從唐人的唐詩選本中已可看出這一傾向。如令狐楚(765-836)

---

⁸⁸ 韋應物於大曆九年(774)出任京兆府功曹；十三年(778)春末夏初轉任鄆縣令，後又自鄆縣改除櫟陽令。按傅璇琮《韋應物系年考證》轉引《新唐書•地理志》，櫟陽縣於大曆年間屬京兆府的畿縣。而當時黎幹爲京兆尹，一直是韋應物上司，直至黎幹被賜死藍田爲止。

⁸⁹ 善福寺位於灋水東岸，韋應物居善福寺西齋。在這一年多的閑居生活中，詩人甚享受寧靜的人生，日後更成爲詩人追憶的主要對象之一，詳見第四章。

⁹⁰ 《校注》，頁 446。

的《御覽詩》⁹¹、韋莊(847-910)的《又玄集》⁹²等，所選基本上是詠物抒情之詩，以至後人忽略了詩人其他類型的作品，也因此長期片面地認識詩人。

從本章的討論中，可以看到大亂之後，詩人折節讀書，決心爲人民作出貢獻，愛國愛民遂成爲詩人一生的生命基調，無論在詩歌創作或行動中，詩人都能言行一致，表現出心繫家國的情懷。直至詩人刺蘇州，生命走到終站，這股熱情並未消失。他並非如一般評論家所言，只在初出仕時表露政治熱情。

無可否認，詩人仕途蹭蹬，偶有心灰意冷之時，遂退居精舍，作暫時「撒離」，這時，詩人往往寫作追憶詩以排遣人生苦悶，詳細分析見「第四章 追憶詩」；而詩人生性高潔，能以恬淡心情面對世俗塵事，詳見「第五章 吏隱詩」。終其一生，詩人游走於入世、追憶與退隱之間，惟以真率爲主。

---

⁹¹ 令狐楚：《御覽詩》(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

⁹² 韋莊：《又玄集》(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第四章 追憶詩

第一節 追憶詩的釋義

「追憶」與「回憶」常被視為同一個概念，《現代漢語詞典》就以「回憶」解釋「追憶」。⁹³《辭海》解釋「追憶」為「再現的一種形式」，⁹⁴「再現亦稱『回憶』、『重現』……再現發生困難時須進行追憶，利用各種線索，引起有關的聯想，進行適當的推理，逐漸恢復遺忘的材料」；⁹⁵《牛津英文字典》給 Rememberance 作這樣的解釋：“have or keep in the memory”；“call back to mind the memory of”。第一個解釋是一些保存在記憶中的回憶，第二個是被召回的記憶。分別在於前者有意識這段記憶的存在，而後者的記憶是潛藏的，需要被召回(call back)，即要經過提醒才想起這段回憶。從字面上看，「回憶」近乎第一種解釋，而「追憶」則較接近第二個解釋，有一種刻意追尋的意思。本文使用「追憶」一詞的時候，所指的主要是第二個解釋：詩人平時未為意一些儲存在腦海中的記憶，在某次特定的提醒(「利用各種線索」)下，腦海裏就回想起(「引起有關的聯想」)，同時嘗試去重整這一段記憶(「進行適當的推理，逐漸恢復遺忘的材料」)。根據這個定義，韋應物的一組悼亡詩，如〈閒齋對雨〉中「端居念往事」的往事指的是他與妻子共同生活的時光，⁹⁶但由於這段往事的憶起是詩人有意識保存在記憶中的，並非由某些「線索」所喚起，只可算是「回憶」，這類詩並非本文探討的對象。

⁹³ 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頁1657。

⁹⁴ 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頁1182。

⁹⁵ 見《辭海》，頁60。

⁹⁶ 見《韋應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405。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追憶——中國古典文學的往事再現》一書中提出了「斷片」一詞，⁹⁷ 它發揮了上文所講「提醒」、「線索」的作用。它是過去殘留下來的，可以以很多不同的模式存在：片斷的文章、零星的記憶、某些殘存於世的人製品的碎片……它們是接引過去和現在的媒介，詩人因為它而被引向失去了的歲月。宇文所安的研究成果對本論文有很大啟發，他從狹義的角度看「斷片」，認為它必須是「某個已經瓦解的整體殘留下的部份」；同時，斷片斷而成片，失去了延續性。因此，被「斷片」所引發的「追憶」在本質上已帶有悲劇性。

然而，我認為無論借用任何理論分析文學作品，其目的都在於更全面地探求真理，切忌削足適履。綜觀韋應物作品，固然有不少作品的「斷片」符合宇文所安的定義，但有些是不符合的，特別「斷片斷而成片，失去了延續性」這一點，但卻無損它誘發追憶的作用。因此，本文將從廣義的角度看「斷片」，即但凡能引起詩人追憶的「提示」都算作斷片，它既不必一定要是某個整體殘留下的部份，也不一定要失去延續性。但如果詩歌中完全沒有觸發追憶的「斷片」，則該詩便不算是追憶詩。

第二節 追憶詩的探討

唐詩追憶的主題「在(公元)八世紀後期十分突出」，⁹⁸ 杜甫的〈憶昔二首〉〈哀江頭〉等、元稹的〈行宮〉〈連昌宮詞〉等、白居易〈江南遇天寶樂叟〉〈贈

---

⁹⁷ 宇文所安《追憶——中國古典文學的往事再現》(北京：三聯書店，2005)。

⁹⁸ 宇文所安《盛唐詩》(北京：三聯書店，2005)。

康叟〉〈梨園弟子〉〈上陽白髮人〉〈霓裳詞十首〉等、皇甫冉的〈華清宮〉、張繼〈華清宮〉、李約〈過華清宮〉、耿漳〈晚次昭應〉、戎昱〈秋望興慶宮〉……而在韋應物的詩歌中，追憶的主題反覆出現。詩人時而直用憶字，時而用其他字眼例如懷、夢等代替。翻看韋應物詩集，涉及憶、懷、夢等字眼的詩歌超過四十首。可見這是韋應物詩作中一個重要的主題。

出生天寶的詩人，在經歷安史之亂及其後無止境的動亂後，難免對昔日令人驕傲、令人依戀的繁華無限緬懷，故在其作品中常能看到對開天盛世的追憶，藉着重構失去了的「樂園」，作為當下窮愁潦倒的解脫。但除了追憶開元天寶外，韋應物還有另一類追憶詩，它們重點在於追憶的過程而非追憶的對象。如果追憶是「為飽受拘限的現實尋找一條出路」，⁹⁹ 長期不斷地回溯反映出詩人常將自己與所處的空間對立，反映出詩人苦悶的心理狀態。

韋應物的追憶詩是複雜的，若籠統地理解為詩人對少年的懷戀，¹⁰⁰ 必流於片面，亦不能全面地認識詩人。而追憶對象其實象徵詩人心目中的理想狀況，因此下文將把韋應物的追憶詩按其追憶對象分成兩部份論述。第一部份為「追憶開元天寶」，第二部份為「開元天寶以外的追憶」。

第一部份：追憶「開元天寶」

台灣學者歐麗娟以「樂園」分析唐代「開元、天寶」時期——一個當代真

---

⁹⁹ 見歐麗娟《唐詩的樂園意識》（臺北：裏仁書局，2000），頁9。

¹⁰⁰ 蔣寅、施蟄存等都持這種意見。

實存在過的歷史經驗、是得而復失的黃金歲月。¹⁰¹ 安史之亂的爆發將唐代人從天堂推向地獄，經歷八年抗戰，¹⁰² 國家非但沒有穩定光復的跡象，更多無法修補的敗象不斷浮現。昔日的光輝不可能再現，四周觸目所及的斷壁頽垣，或者從昔日樂園中殘存下來的「人物碎片」——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斷片」——很容易引發詩人們對開元天寶時期的追憶。這也是中唐追憶主題湧現的重要原因。

生於安史之亂後的詩人們，由於沒有親身經歷過開天盛世，對盛世的印象僅來自文字記載或口述傳說，而觸發他們回憶的「斷片」多數是一些盛世見證者、前朝的遺民口述前事，如元稹〈行宮〉和〈連昌宮詞〉中的「白頭宮女」和「宮邊老翁」；白居易詩中的梨園弟子、宮廷樂師、大內宮女等。而這些詩人只能以「局外人」的身份去追憶這一段往事。而對於親身經歷過開天盛世、作為敏感多情詩人的杜甫來說，能觸發他追憶的「斷片」層面要更廣泛，無論是曲江沿岸重門深鎖的宮門，或是夔州的昆明池都可以觸動詩人，遂能寫下〈哀

---

¹⁰¹ 歐麗娟在其著述中指出，「樂園」(paradise)一詞原自伊朗之波斯文 *pardes*，意指「封圍的庭園、花園、果園、樂園」，後來又演變至可與「天國」(heaven)同義，為義人死後靈魂享有永恆福祉的場所。她歸納出樂園的一些基本特質，包括：一、不易到達；二、豐饒而愉悅；三、封閉而具有選擇性的小世界；四、時間感泯除不存。歐麗娟：《唐詩的樂園意識》（臺北：裏仁書局，2000）。

¹⁰² 安祿山胡父而突厥母，生於突厥，開元初逃來中原。性狡黠，常厚賂往來武惠妃、高力士等小人，以為己延譽。天寶元年，擢升為平盧節度，初無赫赫之邊功。越二年，遞升範陽節度，交結內寵，請為楊貴妃養兒。玄宗對之寵信日深，楊國忠與太子屢奏祿山必反，玄宗不聽。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祿山終以討國忠為名，於範陽起兵作反。安祿山率同羅、契丹、室韋各部凡十五萬眾，號稱二十萬，出範陽，下太原，一路披靡。唐室君臣上下失措，時海內承平日久，府兵頹廢，民不知戰，叛軍所至，州縣望風瓦解。年底，哥舒翰守潼關，郭子儀、李光弼、僕固懷恩在振武破敵，顏真卿兄弟策動河北諸郡起兵討賊，奮力抗敵。可惜翌年六月潼關失守，長安淪陷，玄宗幸蜀，至馬嵬驛，軍士鼓噪，殺國忠，縊貴妃，太子亨即位靈武，是為肅宗。至德二年(757)，祿山被寵人殺於東京，其子慶緒繼。慶緒懦弱，政不自主，唐遣僕固懷恩請援於回紇。回紇策四千騎至，賊兵不敵，求救於史思明。思明引兵來援，入鄴殺慶緒及其四弟。安氏起事，未足四年而滅。史思明亦係突厥雜種人，於安祿山亂平後亦復作亂，上元二年(761)為其子史朝義所弑。廣德元年(763)正月，朝義為其部將李懷仙擒於莫州，梟首送闕下，史氏之亂不足四年而滅。

江頭〉、〈秋興八首〉等經典詩作。

然而，杜甫雖然親身經歷開天盛世，但他能接觸到的多是宮廷以外的普羅大眾，與玄宗最近距離的接觸是一次入朝獻賦。從「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秋興八首其四〉）一聯中可知杜甫當時只能遠遠地看到神秘又神聖的皇帝。因此，在杜甫追憶詩中所重建的開天盛世的畫面，簡直像童話。當然，那不完全是虛構的，但無可否認，即使是杜甫，他仍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去描繪這一段盛世，這自然與曾任玄宗近侍的韋應物不一樣。

在現存的韋詩中，最早的一首便是〈驪山行〉，亦是一首追憶詩。

「君不見開元至化垂衣裳，厭坐明堂朝萬方。訪道靈山降聖祖，沐浴華池集百祥。千乘萬騎被原野，雲霞草木相輝光。禁仗圍山曉霜切，離宮積翠夜漏長。玉階寂歷朝無事，碧樹萋萋寒更芳。三清小鳥傳仙語，九華真人奉瓊漿。下元昧爽漏恒秩，登山朝禮玄元室。翠華稍隱天半雲，丹閣光明海中日。羽旗旄節憩瑤台，清絲妙管從空來。萬井九衢皆仰望，彩雲白鶴方徘徊。憑高覽古嗟寰宇，造化茫茫思悠哉。秦川八水長繚繞，漢氏五陵空崔嵬。乃言聖祖奉丹經，以年爲日億萬齡。蒼生咸壽陰陽泰，高謝前王出塵外。英豪共理天下晏，戎夷讐伏兵無戰。時豐賦斂未告勞，海闊珍奇亦來獻。干戈一起文武乖，歡娛已極人事變。聖皇弓劍墜幽泉，古木蒼山閉宮殿。纘承鴻業聖明君，威震六合驅妖氛。太平遊幸今可待，湯泉嵐嶺還氛氲。」¹⁰³

---

¹⁰³ 《校注》，頁 580。

這首詩寫於廣德二年(764)，詩人出任洛陽丞，自長安赴洛陽途經驪山時作。「驪山」位於今天陝西西安東面，臨潼縣城南。由於山形似驪馬，故稱驪山。她有重要的歷史價值，是周幽王烽火戲諸侯及最後被犬戎所弑的地方，¹⁰⁴ 也是秦始皇陵的所在地。¹⁰⁵ 北面的山麓有溫泉長流不斷，唐皇室於貞觀十八年(622)便在此建湯泉宮，後又於開元十一年(695)十月五日改名溫泉宮。天寶六載(733)再行擴建，改為華清宮。唐中宗李顯(656-710)於景龍三年(709)十二月駕幸驪山溫泉宮，寫下〈登驪山高頂寓目〉，上官昭容(664-710)、崔湜(671-713)、李嶠(645-714)、閻朝隱(?-712)、劉憲(?-711)、蘇頌(670-727)都有詩奉和應制。華清宮後來成為玄宗楊貴妃的離宮，每年臨冬，玄宗便攜楊貴妃及諸姊來此沐浴，遊宴作樂。從岑參(715-769)〈送祁樂歸河東〉「往年詣驪山，獻賦溫泉宮。天子不召見，揮鞭遂從戎」等句可見，唐代士子欲求得到天子賞識，往往會前往驪山獻賦。可以想像驪山當時何等熱鬧：天子貴妃遊樂其中、名士才子前來獻賦。安史之後，華清池被荒廢，它很有潛質成為激發起詩人追憶這段往事的「斷片」。然而，從全唐詩中，我們卻發現曲江更能觸動詩人們。

曲江與驪山相去不遠，位於今西安市南約五公里低窪地帶，唐時此地宮殿連綿，樓閣起伏，每逢上巳(三月三日)、中元(七月十五)、重陽(九月九日)皇室貴族，達官顯貴都會來此遊賞，樽壺酒漿，笙歌畫船，宴樂於曲江池上。每當新進士及第，都會到這個地方來慶賀，四方居民都來觀賞。因此，它比驪山

---

¹⁰⁴ 唐胡曾〈褒城〉：「恃寵嬌多得自由，驪山舉火戲諸侯。祇知一笑傾人國，不覺胡塵滿玉樓。」

¹⁰⁵ 張九齡(678-740)〈和黃門盧監望秦始皇陵〉、鮑溶(不詳，元和四年[809]進士)〈長城〉〈倚琴行〉、韋楚老(803-852?)〈祖龍行〉及杜牧(803-852)〈過驪山作〉都是望驪山而想到秦皇的作品。

溫泉宮更繁華、更能成為盛世的象徵。因此大部份唐詩人寫開天盛世時都愛寫曲江。但韋應物寫曲江的作品很少，卻常常提到「驪山」，這與他的個人際遇有關。

詩人少年因門蔭而成為玄宗三衛侍郎，陪伴玄宗遊幸，在出巡的隊伍前方引領。根據學者傅璇琮〈韋應物繫年考證〉，¹⁰⁶ 任三衛者須「趨悍有材力」，¹⁰⁷ 韋應物在〈射雉〉一詩中寫道「走馬上東岡，朝日照野田。野田雙雉起，翻射鬥回鞭。雖無百發中，聊取一笑妍。」¹⁰⁸ 由此可見，少年韋應物武藝過人，射藝精強，得到女性欣賞，因此頗負盛氣。又由於玄宗曾於驪山給詩人賜浴，驪山對韋應物來說不單是旅遊勝地、有豐富歷史的古蹟、開天盛世的象徵，更見證了他一生最光輝的歲月，無論在個人體格或遭遇上都處於巔峰狀態。這段日子帶給詩人太多美好的回憶，其筆下的開天盛世總是正面的，這與其他詩人帶有諷喻味道的追憶詩篇不一樣。例如杜甫寫於安史亂中的〈哀江頭〉¹⁰⁹，在極寫開天盛世後，筆鋒一轉為「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悲傷、恐怖的氣氛與前面歡樂之極形成強烈對比，充滿諷刺。但〈驪山行〉卻完全不一樣，詩歌以多達三十句的篇幅極寫開元天寶繁華盛世，然後僅以「干戈一起文武乖，

¹⁰⁶ 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

¹⁰⁷ 傅璇琮引獨孤及《毗陵集》卷十二《唐故右金吾衛將軍河南閻公墓志銘並序》，開元中閻公為右衛郎將時上奏疏，雲：「先是有司以三衛執扇登殿引蹕，公奏曰：『三衛皆趨悍有材力，不當升階陞，邇御座，請以宦者代。』」上曰可，遂為故事。」〈韋應物繫年考證〉《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291。

¹⁰⁸ 《校注》，頁534。

¹⁰⁹ 見原詩：「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

歡娛已極人事變。聖皇弓劍墜幽泉，古木蒼山閉宮殿」四句寫「安史之亂」；¹¹⁰ 最後以「續承鴻業聖明君，威震六合驅妖氛。太平遊幸今可待，湯泉嵐嶺還氛氲」作結，帶出對新君主的期望，希望他可以重整旗鼓，讓昔日的繁華再現。而「太平遊幸」是詩人渴望再現的美好畫面，這與杜甫視之為安史禍端不一樣。

當我們瞭解到這首詩是詩人「把筆學題詩」後，現存的第一首詩；寫於安史之亂平定後翌年，詩人第一次出仕途中，就會更容易明白詩人精神面貌與杜甫不同的原因。

〈驪山行〉同時表現出「盛唐氣象」，¹¹¹ 雖經歷禍亂，但仍對生命充滿希望。可是，另一首同樣帶有追憶成份的詩歌——〈四禪精舍登覽悲舊寄朝宗巨川兄弟〉，卻呈現不一樣的精神面貌：

「蕭散人事憂，迢遞古原行。春風日已暄，百草亦復生。

躋閣謁金像，攀雲造禪局。新景林際曙，雜花川上明。

徂歲方緬邈，陳事尚縱橫。溫泉有佳氣，馳道指京城。

攜手思故日，山河留恨情。存者邈難見，去者已冥冥。

臨風一長慟，誰畏行路驚。」¹¹²

這首詩約成於廣德二年(764)由京赴洛途中。當詩人登覽佛寺，眼見今非昔比，悲哀的情緒油然而生。詩中以「溫泉有佳氣」借代驪山，它讓詩人想起了往事，

¹¹⁰ 陶敏、王友勝在《韋應物集校注》前言中指這四句「指出其樂極生悲的悲慘結局，仍然意存諷喻，具有較為強烈現實意義」，我以為詩人雖然點出「歡娛已極人事變」，但問題在於那些不夠忠心的文武官員。而後兩句是對宮殿的封鎖感到惋惜。再配合前面大量對開天盛世的描寫，「意存諷喻，具有較為強烈現實意義」之論恐怕難以成立。

¹¹¹ 「盛唐氣象所指的是詩歌中蓬勃的氣象，這蓬勃不只由於它發展的盛況，更重要的乃是一種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時代性格。」見林庚〈盛唐氣象〉《北京大學學報》(1958年第2期)。

¹¹² 《校注》，頁118。

也想起一些舊人。首句的「憂」字已帶出全詩精神底蘊。「春日」二句令人聯想到杜甫〈春望〉的「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¹¹³ 這令接下來所寫的春日景色毫無生氣，只是一幅死板的風景畫而已。接著詩人想到故人，想到一切已成過去，美好的歲月是「徂歲」，即「過去的」，是失去了的；而曾經經歷的美好事情也是「陳事」，雖然尚縱橫，但始終已成過去。這令「尚縱橫」一語更顯哀傷，揮之不去而又無法再現的美好歲月。而美好不再的原因是有些故人已去逝，即使仍有存者，因為各種因素，難以再見。韋應物這首詩寫於廣德年間(763-764)，卻已不見盛唐氣象，詩歌以「長慟」「畏路」結束，表現出一種強烈的無力感。明胡應麟(1551-1602)以「氣骨頓衰」評論大曆(766-780)詩，從此成為古今定論，¹¹⁴ 而這種時代精神的衰象可以從韋應物的詩中找到一點先聲。從〈驪山行〉到〈四禪精舍登覽悲舊寄朝宗巨川兄弟〉，這種充滿衰敗感的詩歌並非韋詩的全部寫照，但可以讓我們看到詩人心理上的改變，也可以看到唐人精神面貌的改變。

殘酷的現實令詩人樂觀不起來。詩人在〈經函谷關〉一詩中寫道：「徒欲扼諸侯，不知恢至德。聖朝及天寶，豺虎起東北。下沉戰死魂，上結窮冤色。古今雖共守，成敗良可識。藩屏無俊賢，金湯獨何力」；¹¹⁵ 另〈廣德中洛陽作〉亦云：「飲藥本攻病，毒腸翻自殘」，¹¹⁶ 這些作品都反映出詩人對安史禍亂的認識不斷加深：他狠批在位者用人不當，且各懷私心；直斥朝廷引回紇兵殺敵的國策仿如飲鴆止渴。詳見本文第三章興諷詩。韋應物深深明白到這場禍亂之所

---

¹¹³ 仇兆鰲：《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320。

¹¹⁴ 胡應麟：《詩藪》（臺北：廣文書局，1973）。

¹¹⁵ 《校注》，頁382。

¹¹⁶ 《校注》，頁419。

以影響深遠，不單單是因為安祿山、史思明這些作反的「妖氛」(見〈驪山行〉)，更多的原因是「內在的」：人心不正、國策失當。在〈金谷園歌〉中，詩人表面上諷刺晉代石崇窮奢極侈、荒淫無道，¹¹⁷ 但讀者馬上聯想到的玄宗晚年縱情聲色。就在赴洛途中，上任之前，詩人已開始意識到要實踐理想政治的路途是相當艱難的。

果然，在任洛陽丞不久，詩人遇上人生中一個大衝擊。在〈示從子河南尉班〉中，詩人寫道自己因撲扶軍騎而被訟。這件事對韋應物打擊很大，在往後多首詩歌中，我們可以不斷看到這件事對詩人所造成的陰影，例如〈任洛陽丞答前長安田少府問〉「數歲猶卑吏，家人笑著書。告歸應未得，榮宦又知疏」；¹¹⁸ 〈酬李儋〉：「不見同心友，徘徊憂且煩」；¹¹⁹ 〈贈王侍禦〉：「自歎猶為折腰吏」；¹²⁰ 〈溫泉行〉：「頑鈍如錘命如紙。作官不了卻來歸，還是杜陵一男子」¹²¹等。面對不公的現實，詩人一再表現出不妥協的態度，「亦以剛直為政」¹²²「方鑿不受圓，直木不為輪。揆才各有用，反性生苦辛」¹²³。現實中的不如意，令詩人亟須尋找出路，故只要再次碰上適當的「斷片」，就能為詩人提供一條回到昔日美好歲月的出路。〈溫泉行〉、〈燕李錄事〉、〈酬鄭戶曹驪山感懷〉、〈逢楊開府〉、〈白沙亭逢吳叟歌〉、〈與村老對飲〉和〈登(一作發)蒲塘驛沿路見泉谷村墅忽想京師舊居追懷昔年〉應運而生：

---

¹¹⁷ 《校注》，頁 555。

¹¹⁸ 《校注》，頁 13。

¹¹⁹ 《校注》，頁 14。

¹²⁰ 《校注》，頁 78。

¹²¹ 《校注》，頁 556。

¹²² 〈示從子河南尉班〉，見《校注》，頁 70。

¹²³ 〈任洛陽丞請告〉，見《校注》，頁 12。

〈溫泉行〉寫於詩人罷洛陽丞，自洛陽返回長安途中，第二次經過驪山。
這個老地方再一次成為觸發詩人追憶的斷片：

「出身天寶今年幾，頑鈍如鎚命如紙。作官不了却來歸，還是杜陵一男子。」

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遊幸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

玉林瑤雪滿寒山，上昇玄閣遊絳煙。平明羽衛朝萬國，車馬合沓溢四鄣。

蒙恩每浴華池水，扈獵不蹂渭北田。朝廷無事共歡燕，美人絲管從九天。

一朝鑄鼎降龍馭，小臣髡絕不得去。今來蕭瑟萬井空，唯見蒼山起烟霧。

可憐蹭蹬失風波，仰天大叫無奈何。弊裘羸馬凍欲死，賴遇主人杯酒多。」¹²⁴

詩歌的第一句，令人想起陶淵明〈桃花源記〉裏「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這首詩寫於大曆七年(772)，詩人卻將時間停頓於一個過去的時刻——「天寶」，對他來說唯一真實存在、永恆而又不受侵擾的時刻，這是對「現在」的一種否定。上一次經過這個地方的時候，詩人一心要貢獻國家，沒想到結果一事無成，離職歸去，「還是杜陵一男子」一方面可理解作詩人質性剛直，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經歷了作官、被訟之後，還是那個杜陵男子；另一方面，從詩人耿耿於自己仕途失意看來，「還是杜陵一男子」也可理解成對自己一事無成的自嘲。心情鬱悶、經過驪山，再加上北風吹拂，詩人的思緒忍不住又回到那一個時空——先帝遊幸年——詩人年青、得意，騎著「廐馬」引著「天仗」，還有「直入華清列御前」的特權。「一朝鑄鼎降龍馭，小臣髡絕不得去」¹²⁵樂園的中心人物與樂園一同失落了，留下了詩人這個遺民。「今來蕭瑟萬井空」將時空引回眼前，夢醒的詩人眼前所見的是溫泉的煙霧，所面對的是蹭蹬的仕

---

¹²⁴ 《校注》頁 556。

¹²⁵ 「小臣髡絕不得去」《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

途、潦倒窮困的現狀(「弊裘」「凍欲死的羸馬」)，詩人悲痛得「仰天大叫無奈何」，以誇張的口吻自嘲，望主人多賜一杯酒。

〈燕李錄事〉、〈酬鄭戶曹驪山感懷〉、〈逢楊開府〉、〈白沙亭逢吳叟歌〉和〈與村老對飲〉的共通點在於，觸發起詩人追憶的「斷片」都是一些人物，由相識的「李錄事」、「鄭戶曹」、「楊開府」到陌生的「吳叟」、「村老」，他們因為曾經見證開天盛世，當詩人遇上他們，就能透過他們回到那個時光。

李錄事其人不詳，我們只知道他曾經與韋應物一起當玄宗的隨從。〈燕李錄事〉：

「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赤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近

臣零落今猶在，仙駕飄飄不可期。此日相逢思舊日，一杯成喜亦成悲。」¹²⁶

首四句敘述天寶時期詩人任三衛侍郎的時光，一氣呵成，音調鏗鏘，令人讀來也不禁有一份喜悅感。但今日故人相見，彼此都有不同的經歷，自己就仕途蹉跎。雖然可以遇到李錄事，但不禁想到其他的「近臣」今已「零落」，更令人難過的是連玄宗也已去世。樂園的中心人物都已失去，這還算是樂園嗎？樂園有可能再現嗎？李錄事是「樂園的遺民」，¹²⁷ 他可以證明樂園曾經真實存在。作為玄宗遊宴出巡陪襯品的韋應物，本身又何嘗不是「樂園的遺民」？既是「遺民」，即表示「樂園」的一去不再。「一杯成喜亦成悲」，喜的大抵是仍能與故人相聚，悲的是作者認識到，自己已徹底被放逐，永遠都無法返回樂園。詩歌的今昔對比帶出了詩人身世之感。

---

¹²⁶ 《校注》，頁 36。

¹²⁷ 「被放逐的遺民」包括杜甫詩中常見的前朝學有專精的大藝術家、晚唐詩中匿名宮女、樂叟、宮中遺老等。《唐詩的樂園意識》，頁 204。

與〈燕李錄事〉基調相若的還有其名作〈逢楊開府〉：

「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

朝持擣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

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痴。

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

兩府始收迹，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婢嫠。

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坐客何由識，惟有故人知。」¹²⁸

楊開府曾爲十六衛中軍將，大概是詩人任三衛侍郎時期的舊交，對詩人身世甚爲熟識。安史亂後離散，今日始重逢。這時的詩人已經四十五歲，被楊開府這個「斷片」觸發起回憶，三十年前的往事歷歷在目。詩人詳細而率真地回顧過去了的三十年的事跡，「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擣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痴。」讓我們看到一個無賴少年，但也看到一個質直的人。追憶佔了這首詩一半篇幅，可以看出詩人非常緬懷那段日子。詩歌以回到當下作結：「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坐客何由識，惟有故人知。」自安史亂起，詩人流落失職，「憔悴被人欺」。過去種種本來可能被埋藏在記憶深處，但在遇到楊開府這個「斷片」時被勾起。對於楊開府來說，韋應物也許亦是勾起他回憶的「斷片」，今非昔比的又豈只詩人一個。二人不禁悲從中來，詩中「涕俱垂」遂餘韻無窮。

另一首同時期的〈酬鄭戶曹驪山感懷〉：

---

¹²⁸ 《校注》，頁 358。

「蒼山何鬱盤，飛閣凌上清。先帝昔好道，下元朝百靈。

白雲已蕭條，麋鹿但縱橫。泉水今尚暖，舊林亦青青。

我念綺襦歲，扈從當太平。小臣職前驅，馳道出灊亭。

翻翻日月旗，殷殷鼙鼓聲。萬馬自騰驤，八駿按轡行。

日出烟嶠綠，氛氲麗層甍。登臨起遐想，沐浴歡聖情。

朝燕咏無事，時豐賀國禎。日和弦管音，下使萬室聽。

海內湊朝貢，賢愚共歡榮。合沓車馬喧，西聞長安城。

事往世如寄，感深跡所經。申章報蘭藻，一望雙涕零。」¹²⁹

引發詩人追憶的是鄭戶曹，¹³⁰ 更準確一點，應是鄭戶曹所寫的〈驪山感懷〉。這首詩內容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它觸發起詩人的追憶。詩人看到眼前美好的景象：鬱盤的蒼山，高聳入雲的飛閣(人類的成就)，於是想到已去世的玄宗，想到他的好道，但很快又回到現實，看到泉水的尚暖和舊林的尚青。在精神遊離於今昔的情況下，詩人又想起自己當侍衛的日子。在這首詩中，詩人始終將開天盛世與自己的榮辱聯繫。「事往世如寄」，詩人從夢幻中醒來，想到事已往、人生如寄，對自己種種經歷多有感慨。「蘭藻」指鄭戶曹的〈驪山感懷〉詩文辭芳馥如蘭，此刻一望，令詩人傷心流涕。與前詩一樣，詩人通過今昔的錯綜交疊，表達出自己的身世之感。

詩人大曆八年(774)罷洛陽丞，〈白沙亭逢吳叟歌〉寫於同年客遊江淮之時：

「龍池宮裏上皇時，羅衫寶帶香風吹。滿朝豪士今已盡，欲話舊遊人不知。

白沙亭上逢吳叟，愛客脫衣且沽酒。問之執戟亦先朝，零落難艱卻負樵。

¹²⁹ 《校注》，頁 289-290。

¹³⁰ 鄭戶曹：名未詳。其為何州府戶曹參軍，亦未詳。

親觀文物蒙雨露，見我昔年侍丹霄。冬狩春祠無一事，歡游洽宴多頒賜。

嘗陪月夕竹宮齋，每返溫泉灞陵醉。星歲再周十二辰，爾來不語今爲君。

盛時忽去良可恨，一生坎壈何足云。」¹³¹

詩人與吳叟素不相識，正爲「滿朝豪士今已盡，欲話舊遊人不知」而煩惱，剛好遇到這位吳叟，交談之下，「問之執戟亦先朝」，才知道他也是先朝的遺民，跟自己一樣零落，更做起粗活(負樵)來。因爲大家背景相同而生親切感，大談起自己當年的事蹟，「親觀文物蒙雨露，見我昔年侍丹霄。冬狩春祠無一事，歡游洽宴多頒賜。嘗陪月夕竹宮齋，每返溫泉灞陵醉。」真率直露，完全不怕別人見笑。「星歲再周十二辰」¹³²，自韋應物爲三衛至今已二十餘年，「忽去」強調詩人未察覺時間的飛逝，到察覺時，只有無盡的恨意，回首一生，只有不足掛齒的坎壈。這首詩與前面所述的幾首追憶類作品不同之處，在於困擾詩人的現實是「年華老逝」，詩人面對曾經於先朝執戟的吳叟，他自己這時大抵也是一個「老叟」。對方從執戟到今天的負樵，自己又何嘗不是潦倒窮困呢。

另一首類似作品是寫於大曆十三至十四年間(779-780)的七絕〈與村老對飲〉：

「鬢眉雪色猶嗜酒，言辭淳樸古人風。鄉村年少生離亂，見話先朝如夢中。」¹³³

詩人與不相識，年邁仍嗜酒的村老對飲。這位元老人家說話的方式與當時人不一樣，詩人想像他應該經歷過開元天寶盛世。於是興奮地與他談起當年來。亂後出生的年少，對先朝的一切已非常陌生，一方面過去太久，一方面可能與今世相差太遠，因此聽起來都不真實，像夢一般。這位村老身份不明，與詩人素

¹³¹ 《校注》，頁 574。

¹³² 古代以歲星(木星)紀年，以歲星由西向東十二年繞天一周爲一紀，星歲再周即二十四年。

¹³³ 《校注》，頁 62。

不相識，即非舊人；又未必在朝中作過事，只因為他年紀大，他就足以變成「斷片」，引導詩人回歸過去。詩人只是想透過追憶抒發當下的苦悶罷了。

詩人感懷身世，借憶昔抒發內心苦悶的詩作還有一首寫於貞元二年(786)春的〈發蒲塘驛沿路見泉谷村墅忽想京師舊居追懷昔年〉：

「青山導騎繞，春風行旆舒。均徭視屬城，問疾躬里閭。

烟水依泉谷，川陸散樵漁。忽念故園日，復憶驪山居。

荏苒斑鬢及，夢寢婚宦初。不覺平生事，咄嗟二紀餘。

存沒闊已永，悲多歡自疏。高秩非爲美，闌干淚盈裾。」¹³⁴

詩人在江州出巡屬縣，¹³⁵ 首四句即寫出巡情形。五六句寫眼前所見，「煙水依泉谷，川陸散樵漁」觸發詩人追憶。詩中雖有驪山一詞，但在這首詩中，它是追憶的對象而非「斷片」。詩人「沿路見泉谷村墅」而「忽想京師舊居」，隨之「追懷昔年」，冒煙的泉水很容易令詩人想起驪山下的溫泉。詩人在詩中展現出與上述詩歌不一樣的苦況——衰老的感嘆：「不覺平生事，咄嗟二紀餘」¹³⁶以及喪偶的孤獨：「夢寢婚宦初」。¹³⁷ 韋應物約卒於貞元九年(794)，寫這首詩時，詩人已四十九歲，年老、多病及孤獨都催逼著詩人。對一生的總結是「悲多歡自疏」。詩歌被愁苦充斥著，追憶過去美好時光已不再能提供詩人一條出路。

詩人最後一首追憶開天盛世的詩歌寫於次年春(787)江州任上，題曰〈春思〉：

---

¹³⁴ 《校注》，頁 380。

¹³⁵ 蒲塘驛在今江西德安縣。

¹³⁶ 咄嗟指呼吸之間，極言時間流逝之速。

¹³⁷ 韋應物約於安史之亂期間成婚，與賢妻患難與共二十載，感情深厚。後其妻約於大曆十年前後病故，詩人寫有十八首悼亡詩紀念妻子。

「野花如雪繞江城，坐見年芳憶帝京。

閨闔曉開凝碧樹，曾陪鴛鴦聽流鶯。」¹³⁸

詩歌首句令人想起〈燕李錄事〉的「花開漢苑經過處」。看着春日繁花似錦，詩人憶起昔日京城。眼前皇宮大門(閨闔)旁碧樹聳立，詩人想到這棵樹昔日曾經陪玄宗貴妃(鴛鴦)遊樂(聽流鶯)。整首詩所寫的都是今景，昔日的記憶是遙遠的，而詩中「坐見」一詞亦表現出詩人的無奈。

第二部份 「開元天寶」以外的追憶

除了追憶開天盛世，我們發現詩人還有大量其他追憶的作品，而這類詩歌由詩人任洛陽丞開始已不斷出現。綜觀這些追憶詩雖沒有固定的追憶對象，有追憶武功寶意寺的，有追憶灋上生活的，也有以「故園」作為追憶對象的，雖各有不同，但它們都指向一種閑適、脫離官場的生活狀況。

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次年六月，京師陷，詩人流落失職，避居武功等地，而寶意寺就在武功，詩人遂在該處避亂。二十年後，大曆十年(775)，詩人為京兆府功曹。時詩人以事使武功，途經寶意寺，聽到寺鐘憶起往事，寫下〈登寶意寺上方舊遊〉

「翠嶺香臺出半天，萬家烟樹滿晴川。

諸僧近住不相識，坐聽微鐘記往年。」¹³⁹

---

¹³⁸ 《校注》，頁 368。

¹³⁹ 《校注》，頁 427。

詩人所追憶的那段日子，其處其實相當狼狽：風光不再，失職避難，甚麼東西值得詩人懷戀呢？從詩人同時期另一首〈經武功舊宅〉可知當時寶意寺舊居已破落，「居人少」「野田綠」，令詩人不勝唏噓。¹⁴⁰ 而詩人重遊舊地很有可能爲了探望一下昔日相識的僧侶，可惜「諸僧近住不相識」，於是坐下來，聽到寺院的鐘聲，這「依舊的鐘聲」遂帶領詩人回到昔日。詩人沒有再寫下去，這與他追憶開天盛世的詩作中詳寫盛世景況不同。詩人已不再沉迷於虛無的開元天寶盛世，也不再緬懷自己一去不返的光輝歲月，反而想念起自己落難時，實實在在的舊相識和所居住過的地方。

自寶應二年(763)出仕洛陽丞至大曆十年(776)爲京兆府功曹，詩人已經歷十餘載仕宦生涯，加上身體漸見衰象，曾於大曆八年(774)養疾同德寺，種種經歷使詩人不再耽溺於開天盛世，反而更眷戀閒居的日子。大曆十二年(778)，與詩人相濡以沫多年的伴侶離世了。十四年(780)，詩人辭退櫟陽令，七月歸至長安西郊灋上善福精舍。詩人閒居所得的快樂可從建中二年(781)春所寫的〈春日郊居寄萬年吉少府中孚三原少府偉夏侯校書審〉得知。全詩透露出一種曠淡之情，在心無所慮的情況下，欣賞「谷鳥時一囀，田園春雨餘。光風動林早，高窗照日初。」自己心淡而閒適，友人爲世俗而奔波(「城闕應多事」)，¹⁴¹ 詩人表露了他的生活取向。在往後的日子，詩人顯然對這段日子非常懷念，常於詩中追憶這段往事。果然，同年秋天，詩人出任尚書省比部員外郎時，就因夜色、山水寫下追憶灋上生活的作品：〈秋夜南宮寄灋上弟及諸生〉

---

¹⁴⁰ 《校注》，頁 384。

¹⁴¹ 《校注》，頁 130。

「暝色起煙閣，沉抱積離憂。況茲風雨夜，蕭條梧葉秋。

空宇感涼至，頽顏驚歲周。日夕遊闕下，山水憶同遊。」¹⁴²

「南宮」即尚書省。「暝色」「離憂」「蕭條」「頽顏」等字眼令詩歌瀰漫着一股陰冷的氣氛，鬱悶的詩人為什麼會想起昔日灋上生活？如果這首詩沒有觸發追憶的「斷片」，它就不算是追憶詩。但若單從這首詩看，似乎難以找到答案。我們可以從詩人另一首追憶作品找到啓示。建中三年(782)，詩人出任滁州刺史時寫下〈題桐葉〉

「參差剪綠綺，瀟灑覆瓊柯。憶在灋東寺，偏書此葉多。」¹⁴³

詩人運用借喻的手法寫眼前所見的梧桐樹，謂桐葉如綠色織錦剪成(綠綺)，樹幹如美玉(瓊柯)。而灋東寺的梧桐葉很多，眼前的梧桐葉遂變成聯繫兩個時空的「斷片」。當我們回看〈秋夜南宮寄灋上弟及諸生〉中「蕭條梧葉秋」一句，可以推想，在那個陰冷的秋夜，蕭條的梧桐葉正是觸發詩人追憶灋上生活的「斷片」。建中二年(781)，詩人還有一首懷念灋上幽居的作品〈憶灋上幽居〉，可以讓我們更了解詩人當時苦悶的心情。

「一來當復去，猶此厭樊籠。況我林棲子，朝服坐南宮。

唯獨問啼鳥，還如灋水東。」¹⁴⁴

詩歌首二句套用陶淵明〈歸園田居〉「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及「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的詩意，表現出對官場的極度厭倦；〈秋夜南宮寄灋上弟及諸生〉中的「頽顏驚歲周」也是促使詩人懷戀幽居的原因；而〈題桐葉〉中雖沒有表露明顯詩人的負面情緒，然劉辰翁謂其「此等無情憔悴語，他不多見」，可見這三首追憶灋上生活的作品都是詩人在鬱悶的情緒下寫成。

---

¹⁴² 《校注》，頁 135。

¹⁴³ 《校注》，頁 528。

¹⁴⁴ 《校注》，頁 378。

韋應物出任滁州刺史時，寫灋上生活的作品尚有〈答重陽〉¹⁴⁵ 和〈重九登滁城樓憶前歲九日歸灋上赴崔都水及諸弟讌集悽然懷舊〉¹⁴⁶ 兩首。即使到了蘇州刺史任內，灋上閒居生活仍是詩人追慕對象之一，如寫於建中四年(784)的〈答崔都水〉。¹⁴⁷ 這幾首詩歌皆以灋上生活與當下不如意的仕宦生活對比。這主要是因為詩人出仕卻又未能有所作為，〈答崔都水〉中「終年不事業，寢食長慵頑。不知何為來，名籍挂郎間。攝衣辭田里，華簪耀頹顏」「忽忽已終日，將酬不能宣。甿稅況重叠，公門極熬煎……勿厭守窮轍，慎為名所牽。」諸句已清楚表明詩人所面對的困境。¹⁴⁸

或問韋應物既然如此不滿於仕宦生活，何不學陶淵明辭官歸隱？日本學者近藤元粹對詩人〈雨夜宿清都觀〉中「豈戀腰間綬，如彼籠中禽」一聯評說：「已知籠禽之困，何不決然學柴桑先生？」¹⁴⁹學者蔣寅就曾指出「隱逸雖然從觀念上說很符合中國文人追求精神自由的理想，但在實際生活中卻不免與他們現實的功利態度相悖。尤其在大曆那麼一個物質匱乏的時代，辭官隱居是不太現實的。」¹⁵⁰ 在《大曆詩風》中他也曾詳寫這時期士人生活的貧困狀況：「大曆貞元時期是唐帝國財政極度窘迫的時候，吏員的官俸，不僅被減削，還常常拖欠，以至於清廉的士大夫為官不能養家，甚至悲慘到受餓而死的地步。當時人詩中也常言及貧困而艱不自舉的情形。為官者尚叫窮不迭，布衣的日子當然就

---

¹⁴⁵ 《校注》，頁 334。

¹⁴⁶ 《校注》，頁 379。

¹⁴⁷ 《校注》，頁 321。

¹⁴⁸ 《校注》，頁 327。

¹⁴⁹ 《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154。

¹⁵⁰ 蔣寅：《大曆詩人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96。

更艱難了。」¹⁵¹ 由此可知，韋應物雖然極度厭倦仕宦生活，但爲生計又無法歸去，惟有在創作中找尋出路，也因此，在「灋上生活」的日子變成了追慕的對象。

韋應物爲京兆杜陵人。¹⁵² 對他來說，長安不只是首都，更是他的故鄉。安史之亂前，詩人主要生活在長安；亂事爆發後，他曾逃到武功等地。洛陽被收復後，他在廣德元年（763）出任洛陽丞，不過後來因撲扶軍騎而罷職。大曆九年至十二年（774—777）任京兆府功曹，再次回到長安。期間，大曆四年也曾短暫留在長安。（據陶敏〈簡譜〉）由此可知，詩人在長安應有過一種特殊的生活經驗，遂對長安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韋詩中提及「追憶故園」的地方，數量實在多不勝數。有時詩人直稱「杜陵」之名，如「憶在杜陵田舍時」¹⁵³、「閑居夢杜陵」¹⁵⁴、「心思杜陵道」¹⁵⁵、「惆悵杜陵曲」¹⁵⁶、「家園杜陵下」¹⁵⁷。有時又用「故園」、「舊居」，以表思鄉之情，如「空令憶舊居」¹⁵⁸、「已懷故園情」¹⁵⁹、「寧知故園月」¹⁶⁰、「思憶故園行」¹⁶¹、「坐憶故園人已老」¹⁶²、「故園茲日隔」¹⁶³、「忽憶故園人」¹⁶⁴、

---

¹⁵¹ 蔣寅：《大曆詩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 87。

¹⁵² 杜陵，是漢宣帝陵，唐代屬京兆府萬年縣，今陝西西安東南。

¹⁵³ 〈九日〉，見《校注》，頁 513。

¹⁵⁴ 〈假中對雨呈縣中僚友〉，見《校注》，頁 68。

¹⁵⁵ 〈寒食日寄諸弟〉，見《校注》，頁 156。

¹⁵⁶ 〈春中憶元二〉，見《校注》，頁 368。

¹⁵⁷ 〈任洛陽丞請告一首〉，見《校注》，頁 491。

¹⁵⁸ 〈任洛陽丞答前長安田少府問〉，見《校注》，頁 287。

¹⁵⁹ 〈樓中閱清管〉，見《校注》，頁 511。

¹⁶⁰ 〈樓中月夜〉，見《校注》，頁 431。

¹⁶¹ 〈京師叛亂寄諸弟〉，見《校注》，頁 168。

¹⁶² 〈答端〉，見《校注》，頁 332。端，指韋端，他是韋應物的從弟。

¹⁶³ 〈寄職方劉郎中〉，見《校注》，頁 154。

¹⁶⁴ 〈見紫荊花〉，見《校注》，頁 521。

「故園諸弟益相思」¹⁶⁵、「故園何日歸」¹⁶⁶、「還思故園夜」¹⁶⁷、「故園眇何處」¹⁶⁸、「始有故園思」¹⁶⁹、「逾懷故園愴」¹⁷⁰、「何處愁人憶故園」¹⁷¹、「重軫故園愁」¹⁷²、「忽念故園日」¹⁷³。有時詩人也用「秦關」、「秦川」、「漢陵」、「京華」等，代替「故園」，如「獨夜憶秦關」¹⁷⁴、「終憶秦川賞」¹⁷⁵、「憶在漢陵原」¹⁷⁶、「忽省京華年」¹⁷⁷。

與追憶灋上生活的詩作比較，我們不難發現韋應物追憶故園的詩歌中基本上不會記述、描繪故園的景象，而只就眼前景物帶出這種追憶的感情。例如寫於大曆二年(767)春〈任洛陽丞答前長安田少府問〉

「相逢且對酒，相問欲何如。數歲猶卑吏，家人笑著書。

告歸應未得，榮宦又知疏。日日生春草，空令憶舊居。」¹⁷⁸

詩人因困守微官，告歸不得而感到苦悶，眼前的「春草」並未給詩人生意盎然的感覺，反而令他想起舊居。要注意的是，這首追憶詩並未對被追憶的對象的景色(即舊居種種)作任何描寫，詩中所寫盡是今景，而舊居只是困苦現狀的出路。

---

¹⁶⁵ 〈閒居寄諸弟〉，見《校注》，頁161。

¹⁶⁶ 〈西樓〉，見《校注》，頁432。作於滁州。

¹⁶⁷ 〈夜對流螢作〉，見《校注》，頁518。

¹⁶⁸ 〈聞雁〉，見《校注》，頁536。

¹⁶⁹ 〈九日〉，見《校注》，頁607。

¹⁷⁰ 〈夏景端居即事〉，見《校注》，頁500。

¹⁷¹ 〈聽鶯曲〉，見《校注》，頁572。

¹⁷² 〈遊靈巖寺〉，見《校注》，頁454。

¹⁷³ 〈發蒲塘驛沿路見泉谷村墅忽想京師舊居追懷昔年〉，見《校注》。頁380。

¹⁷⁴ 〈夕次盱眙縣〉，見《校注》，頁388。

¹⁷⁵ 〈陪王卿郎中遊南池〉，見《校注》，頁449。

¹⁷⁶ 〈始夏南園思舊里〉，見《校注》，頁380。

¹⁷⁷ 〈雪中〉，見《校注》，頁516。據校記，「省」字《文苑英華》作「憶」。

¹⁷⁸ 《校注》，頁287。

再看寫於建中三年(782)初到滁州任時的〈樓中閱清管〉為例：

「山陽遺韻在，林端橫吹驚。響迴憑高閣，曲怨繞秋城。

淅瀝危葉振，蕭瑟涼氣生。始遇茲管賞，已懷故園情。」¹⁷⁹

這首詩用了向秀〈思舊賦〉的典故¹⁸⁰，表現懷念舊居之情。秋天的蕭條，涼風蕭瑟，草木搖落，處處引起詩人對歲月匆匆流逝的傷感。觸發這個在作客他鄉的遊子追憶故園的「斷片」是在樓中所聞的音樂聲——清管。但故園的情景如何，為何令詩人如此依戀則完全沒有提及。詩中所寫的全係當下眼前所見所感。又例如建中四年(784)所寫的〈始夏南園思舊里〉一詩中，韋應物描寫了春去夏至的景色：

「夏首雲物變，雨餘草木繁。池荷初帖水，林花已掃園。

縈叢蝶尚亂，依閣鳥猶喧。對此殘芳月，憶在漢陵原。」¹⁸¹

林花在雨後漸漸零落，只留下蝴蝶亂飛，飛鳥鳴叫，使人倍覺寂寥。對著殘月，詩人自然思念故園，所謂「月是故鄉明」。¹⁸² 此外，寫於貞元五/六年(789/790)蘇州任上的〈遊靈巖寺〉寫詩人目睹吳楚之景後，興起軫惜故園之愁。¹⁸³ 詩中所寫盡是眼前所見之景。故園描寫的缺席反映出詩人沒有糾纏在昔日的生活之中，純粹流露出淡淡的鄉愁，與追憶開元天寶的詩作及追憶灋上生活異趣，漸漸流露出淡泊閑遠的風格。

為什麼韋應物反覆追憶著故園長安呢？這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可是詩中沒有直接說明，又甚少對回憶景象描寫，這固然給讀者淡泊深遠的感覺，但卻

---

¹⁷⁹ 《校注》，頁 511。

¹⁸⁰ 向秀〈思舊賦〉：「濟黃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舊居。……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

¹⁸¹ 《校注》，頁 380。

¹⁸² 杜甫〈月夜舍憶弟〉。

¹⁸³ 《校注》，頁 454。

也帶給研究者不少難題。我們只能透過他的生平和詩作的隻字片言，試圖探討他對故園長安追憶的原因。

根據韋詩所述，我們可以知道韋應物居住長安時期的生活是十分美好的。試看韋應物〈發蒲塘驛沿路見泉谷村墅忽想京師舊居追懷昔年〉一詩。這首詩在分析追憶開元天寶時期部份已然提及過，今只集中討論其中「故園」所隱含的意思。這裏的故園令詩人想起居住驪山的時光，也即任三衛時的風光事跡；而「夢寢婚宦初」，指他成婚和踏上仕途。由此可見，長安代表詩人過去美好的時光，詩中為失去這段時光而悲傷。在〈廣德中洛陽作〉中「西懷咸陽道」，認為「生長太平日，不知太平歡。今還洛陽中，感此方苦酸。」¹⁸⁴ 由此可見，在他心目中，居住在長安的歲月就是閑適安寧的生活。

從現存的韋詩看，韋應物十分依戀長安的閑適生活，即使他做了洛陽丞，因病請假時仍於詩中說：「休告臥空館，養病紀囂塵。游魚自成族，野鳥亦有群。家園杜陵下，千歲心氛氲。」¹⁸⁵ 後來因事罷職，回到長安，他不但不感到委屈，反而說：「何處醉春風，長安西復東。不因俱罷職，豈得此時同。」¹⁸⁶ 當韋應物任京兆府功曹時，經常遊覽自然景物，不願被公務所累，以保持淡泊閑靜的心境。當離開官舍，他與同僚聯騎而行，欣賞「翻翻烏未沒，杳杳鍾猶度。尋草遠無人，望山多枉路」之景，體會到「出入雖見牽，忘身緣所晤」。¹⁸⁷ 有時

---

¹⁸⁴ 《校注》，頁 419。

¹⁸⁵ 〈任洛陽丞請告一首〉，見《校注》，頁 491。

¹⁸⁶ 〈陪元侍御春游〉，見《校注》，頁 436。

¹⁸⁷ 〈晚出府舍與獨孤兵曹令狐士曹尋朱雀街歸里第〉，見《校注》，頁 492。

他又會「官舍耿深夜，佳月喜同游」，陶醉於蒼蒼的月色。¹⁸⁸ 休暇之日，他偃臥東齋，「懷仙閱《真誥》，貽友題幽素。榮達頗知疏，恬然自成度。」¹⁸⁹ 於是他提及杜陵，不是稱作「閑居」，¹⁹⁰ 就是稱作「田舍」。¹⁹¹ 而說到遊覽，總少不了長安的名勝，所謂「憶昔終南下，佳遊亦屢展」。¹⁹² 這在在都表明「故園」在詩人心中代表美好生活，更重要的是，他覺得那是美好的田園生活。

如果將可考知寫作年代的二十一首追憶故園詩，按先後次序排列起來，我們可以發現其中十七首寫於詩人滁州、江州、蘇州刺史任上，尤以滁州為甚，佔其中十二首。

詩人於建中三年(782)出為滁州刺史，至興元元年(784)罷職寓居滁州西澗，到貞元二年(786)再出任江州刺史，前後僅四年。究其原因，我認為可能與韋應物的潔澹稟性有關。詩人雖有志濟世，但本性不喜世俗繁務，每當官況味冷，自覺無所作為，例如「郡中永無事，歸思徒自盈」¹⁹³、「盡日高齋無一事」¹⁹⁴、「府中徒冉冉，明發好歸休」¹⁹⁵、「遇此庭訟簡」¹⁹⁶，便會想起故園的閑適生活，希望早日還鄉。其實早在洛陽丞任上，他已經萌生這種念頭，試看〈任洛陽丞答前長安田少府問〉¹⁹⁷。面對長安故人，韋氏訴說著宦途蹭蹬，既不滿官卑，又苦於告歸。王維詩云：「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如今他空有懷歸

¹⁸⁸ 〈府舍月游〉，見《校注》，頁 442。

¹⁸⁹ 〈休暇東歸〉，見《校注》，頁 494。

¹⁹⁰ 〈假中對雨呈縣中僚友〉云：「閑居夢杜陵」，見《校注》，頁 68。

¹⁹¹ 〈九日〉云：「憶在杜陵田舍時」，見《校注》，頁 513。

¹⁹² 〈自蒲塘驛迴駕經歷山水〉，見《校注》，頁 391。

¹⁹³ 〈寄職方劉郎中〉，見《校注》，頁 154。

¹⁹⁴ 〈閑居寄諸弟〉，見《校注》，頁 161。

¹⁹⁵ 〈夜對流螢作〉，見《校注》，頁 518。

¹⁹⁶ 〈夏景端居即事〉，見《校注》，頁 500。

¹⁹⁷ 《校注》，頁 287。

之意，卻不能達成心願。「故園」「舊居」遂成為詩人閑居歸隱的象徵，淡泊心靈的皈依。

因此，當遇到令詩人心情激越的事時，追憶故園往往能為詩人提供一條出路。如建中四年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領兵經長安，發生兵變，德宗出奔奉天，亂兵擁原涇原節度使朱泚為帥，泚自稱大秦皇帝，進攻奉天。韋應物寫了〈京師叛亂寄諸弟〉云：

「弱冠遭世難，二紀猶未平。羈離官遠郡，虎豹滿西京。

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歸去在何時，流淚忽霑纓。

憂來上北樓，左右但軍營。函谷行人絕，淮南春草生。

鳥鳴野田間，思憶故園行。何當四海晏，甘與齊民耕。」¹⁹⁸

首四句是相當激憤的，「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點出不能歸去的原因，「歸去在何時，流淚忽霑纓」更是悲從中來。不過，詩的下半部分，情緒變得平靜起來，所謂「函谷行人絕，淮南春草生。鳥鳴野田間，思憶故園行」，函谷關是赴長安的主要道路，「行人絕」指因戰亂而道路塞，然後筆鋒轉到詩人身處之地，以春草暗指歸情¹⁹⁹，田野間的鳥鳴聲觸發詩人對故園之思，這個「斷片」讓詩人從當下的亂局中找到出路。

第三節 小結

---

¹⁹⁸ 《校注》，頁 168。

¹⁹⁹ 《楚辭·招隱士》：「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總結韋應物追憶詩歌，詩人往往通過「斷片」的提醒，觸發對過去某段日子的追憶。而當詩人所面對的現況越不理想，能觸發他的「斷片」也相對較多。在追憶開元天寶一類作品中，我們發現「驪山」、前朝遺老是觸發詩人追憶的主要「斷片」。而這類作品中，往往對追憶景象有較大篇幅的描寫，通過重構樂園景象，讓詩人一方面重溫象徵一去不返的盛世，一方面也重溫詩人本身光輝月歲。但隨着詩人的閱歷加深，這種描寫所佔的篇幅也越來越少，反映出詩人對生命的一種覺醒——不能再深醉在過去那不可復返的時光。

而另一類追憶作品的追憶對象較多樣化，分別有「武功寶意寺」、「灋上生活」和「故園」。這些被追憶的對象的共通點是詩人當時都是離開官場的。觸發這類追憶的「斷片」可謂種類繁多，大多是一些自然物象如春草春花、梧桐葉、流螢、飛雁等，這反映出這些理想狀況在詩人心中處於一個非常活躍的狀態，只要稍經提醒，就能引領詩人回溯。無奈的是戰亂不止、社會不寧，士人無法擺脫生活困況，明知無所作爲，爲求生計，仍要勉強出仕。於是唯有透過追憶去表達詩人渴望徜徉山水的心志。

無論是哪一種追憶詩，它都反映出詩人希望透過追憶某一個時空，爲當下的狀況、困局尋找出路，因此，它的情感基調必然是較負面的。

第五章 韋應物的吏隱詩

第一節 「吏隱詩」釋義

中國自古已有隱逸的傳統，這種風氣在唐代更爲熾熱，而且有著不同階段的變化。「仕」與「隱」所指涉的人生處境關係對立，驟眼看似水火不容，事實卻不然。關於唐代士人的社會心態與隱逸的嬗變，特別是仕與隱相輔相成的處世態度，學者李紅霞有文論及。其文指出唐代的隱逸可以分爲四期：一、承繼期，初唐人往往承繼魏晉名士避世的生活方式，也有人推崇「大隱」，²⁰⁰ 身處朝廷高位，在公退之餘，優遊於庭臺園林之間。二、高潮期，盛唐人常以隱居爲入仕的捷徑，在山林中互相激勵名節，伺機而動。三、轉型期，中唐人如白居易，面對政治環境日益惡化的環境，追求精神的超脫自由，但也不放棄閒散的官職和豐厚的奉祿。四、衰落期，政治動蕩使晚唐人縱然滿懷壯志，也無能爲力，無可奈何，只好避亂歸隱。²⁰¹

在李紅霞所列的四期裏，我們特別注意到她在第三期談到中唐人居官如隱，既受朝廷俸祿，同時又追求精神超脫自由。這種隱逸的方式接近本文將要討論的「吏隱」，但是李紅霞還未正式論及。劉蔚在〈試論韋應物的吏隱心態與

---

²⁰⁰ 晉王康璩《反招隱詩》：「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文選》）。

²⁰¹ 李紅霞〈唐代士人的社會心態與隱逸的嬗變〉《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5期，頁114-120。按、隱逸這種行爲，很難簡單地給予高潮、衰落的判斷，雖然如此，李紅霞此文其實指出了唐代的不同類型隱逸，可足參考。

儒道禪思想之關係》一文稱，「韋應物的詩歌多作於任上，他一方面忠於職守，完成作為官吏所應盡的世俗職責，另一方面又能保持隱士般清閒自在之心態，他走的是一條更為複雜的吏隱之路。」²⁰² 雖然他使用了「吏隱」一詞，卻仍未能點出吏隱中「吏」字的特定涵義。及見蔣寅在〈古典詩歌中的「吏隱」〉所闡釋「吏隱」的含義始明，他說：

「『吏隱』不光是『雖居官而猶如隱者』，它特指地位不高的小官僚詩人居官如隱的一種處世態度。」²⁰³

蔣寅還指出唐代的吏應指流外官和雜任，但吏的卑賤地位仍深入人心，所以品級低而事務冗雜的州府僚佐，即使屬於流內九品，人們也常目為吏。後世便將習法令的簿書之吏，與衣冠縉紳之官，區分開來。而且「在唐代，像校書郎、正字、拾遺、補闕之類，雖品級不高，但位居清要，絕不被視為吏。蓋唐人重朝官，輕外官，同樣的品級，郎官遠比刺史榮耀，諫官遠比州郡僚屬榮耀。」²⁰⁴

由此可見，就居官如隱而言，「吏隱」實不同於「仕隱」。「仕隱」指身處要位而居官如隱的人，即所謂「大隱」。「吏隱」則指官卑言輕而居官如隱的人，這種官位卑微往往是一種心理表現和文化心態，不能單單以品位來判斷。就韋應物而言，建中二年，他除尚書刑部比部員外郎，為從六品上，後來歷任滁州、江州及蘇州刺史，滁州刺史為正四品下，江州為上州，刺史為從三品，蘇州比江州更大。就此看來，韋氏的官職是越做越大的。²⁰⁵ 然而，比部員外郎之任不到兩年，²⁰⁶ 對韋氏性情、思想的影響不大。至於刺史之職，他不以為它有多清要。對詩人來說，擔任刺史只是守郡僻壤，非其所願，回朝任官才是他理想所

²⁰² 劉蔚：〈試論韋應物的吏隱心態與儒道禪思想之關係〉《徐州教育學院學報》，第16卷第3期（2001年9月），頁34。

²⁰³ 蔣寅：〈古典詩歌中的「吏隱」〉《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3月第2期，頁54。

²⁰⁴ 蔣寅：〈古典詩歌中的「吏隱」〉，頁53-54。

²⁰⁵ 胥雲：〈韋應物事迹考評〉，載《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2期）。這點意見承蒙許子濱博士指出。

²⁰⁶ 建中二年四月十九日至建中三年夏。詳參孫望《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2）及陶敏、王友勝：《韋應物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1998）。

在。就以品秩最高的蘇州刺史為例，他在任上慨嘆「政拙勞詳省，淹留未得歸。」²⁰⁷，又當友人入京爲官時，韋氏即熱烈恭賀，並常說到自己獨處海隅，蹉跎時光，相形見絀，如送豆盧策，說「歲交冰未泮，地卑海氣昏。子有京師游，始發吳閶門」²⁰⁸；送雷監，說「時方重右職，蹉跎獨海隅」²⁰⁹；送鄒儒立，說「省署慚再入，江海綿十春。今日閶門路，握手子歸秦」²¹⁰。事實上，韋應物甫在滁州任上，就已認爲刺史對國家的貢獻有限，他說「丈夫當爲國，破敵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鬢毛班」²¹¹，刺史不及軍人，又說「羈離官遠郡，虎豹滿西京」²¹²，守郡遠離京師，對於拯救禍患，有心無力。因此，韋應物的隱逸是吏隱，不是仕隱。

然則，「吏隱」是否等同白居易的「中隱」？這又不盡然。白居易〈中隱〉詩說：

「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
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不勞心與力，又免飢與寒。終
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²¹³

他不但強調精神的自由適性，也注重生活的安逸閒適，所謂「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是最好的寫照。過「中隱」的生活，經濟條件不能太差，否則忍受「冷落」、忍受「飢寒」，就與「小隱」無別；工作也不能太多，太多則忙碌不堪，勞心勞力，沒有悠閒。而本文所說的「吏隱」，則包含吏的生活，既要面對營營役役的公務，也要有惠及百姓的熱誠。吏隱的詩人官卑位輕，不能全身遠

²⁰⁷ 〈贈李判官〉《韋應物集校注》，頁 198。此詩《校注》定爲約貞元六年初夏在蘇州作。

²⁰⁸ 〈送豆盧策秀才〉《韋應物集校注》，頁 280。此詩《校注》定爲約貞元七年早春在蘇州作。

²⁰⁹ 〈送雷監赴闕庭〉《韋應物集校注》，頁 283。此詩《校注》定爲約貞元六年在蘇州作。

²¹⁰ 〈送雲陽鄒儒立少府傳奉還京師〉《韋應物集校注》，頁 278。此詩《校注》定爲約貞元六年春在蘇州作。

²¹¹ 〈寄暢當〉《韋應物集校注》，頁 164。此詩《校注》定爲建中四年秋在滁州作。

²¹² 〈京師叛亂寄諸弟〉《韋應物集校注》，頁 168。此詩《校注》定爲興元元年春在滁州作。

²¹³ 白居易：〈中隱〉《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 1493。

害，逃避憂患，逃避繁重的公務，只能夠在心靈上超越塵世。韋應物即使在刺史任上也反覆強調簿書案牘之勞，理民聽訟之苦，這正好體現出吏隱詩的特質。

214

台灣學者侯迺慧用「郡齋詩」來探討唐代文士的仕隱情況。事實上，唐詩中時常出現「郡齋」一詞，郡齋指「各州郡刺史及其官員們處理公務的所在地。」是官員們辦公的地方，也是地方官居住的府第，故有時又被稱作「官舍」。同時，為滿足老百姓洽談公事或官員應酬交遊的需要，郡齋又成為居民大眾平日休閒的公共場所或宴賞風景的遊憩區。因此，「郡齋」是一個集辦公、居家、宴集、遊賞等多功能的場所。而所謂「郡齋詩」指在詩題或詩句中出現「郡齋」字樣的詩。有些詩歌並未出現「郡齋」二字，而以「官舍」、「郡宅」、「郡亭」或「郡」字代替，這些也都屬於郡齋詩的討論範圍。²¹⁵

韋應物一生沒有當過什麼顯赫的職位，比較重要的官職有滁州刺史、江州刺史、蘇州刺史，這些時間他的創作仍然不絕。那麼，可否用「郡齋詩」去研究韋應物寫居官如隱的詩歌呢？我認為這也是不恰當的。

對於「郡齋詩」，韋應物有其個人的特殊看法，他在〈酬劉侍即使君〉中云：

²¹⁴ 例如「簡牘已云疲」（〈始至郡〉）、「永日簡牘餘」（〈張彭州前與綏氏馮少府各惠寄一篇多故未答張已云沒因追哀敘事兼遠簡馮生〉）、「吏案正盈前」（〈贈琮公〉）、「厖稅況重疊，公門極熬煎」（〈答崔都水〉）、「自歎乏弘量，終朝親簿書」（〈再遊西山〉）、「几閣文墨暇」（〈南園陪王卿遊囑〉）、「方將厖訟理」（〈新理西齋〉）、「於茲省厖俗，一用勸農桑」（〈登重玄寺閣〉）、「方將厖訟理」（〈新理西齋〉）、「訟簡得遨遊」（〈襄武館遊眺〉）、「遇此庭訟簡」（〈夏景端居即事〉）、「大藩本多事，日與文章疎」（〈贈丘員外二首〉）、「高閒庶務理」（〈酬劉侍即使君〉）。詳參下文對韋應物吏隱詩的分析。

²¹⁵ 侯迺慧：《唐詩主題與心靈療養》（台北：三民書局，2005），頁183。

「繼作郡齋什，遠贈荆山珍」。²¹⁶ 侯迺慧認為這是詩人有意識地將「郡齋詩」與其他類型詩作分開，²¹⁷ 但陶敏、王友勝認為「郡齋什」專指〈郡齋雨中與諸文士宴集〉一詩。²¹⁸ 陶敏、王友勝的理解有其道理，因為詩題的劉侍郎即劉太真，他曾唱和韋氏的〈郡齋雨中與諸文士宴集〉，²¹⁹ 正與「繼作郡齋什，遠贈荆山珍」的詩意配合。其實這兩種理解可視為廣義和狹義之分別：侯迺慧的屬於廣義，指在郡齋中所作的詩歌；陶敏、王友勝的則屬於狹義，指在郡齋宴集時所作的詩歌。不過無論從廣義還是狹義來看，以「郡齋詩」作為研究韋應物詩的範圍，都未免太狹窄了，根本無法看清韋應物的吏隱生活。以在郡齋所寫的詩作為研究對象，詩人離開郡齋出遊賞景之作就不能包含其中，況且吏隱的心態，詩人在擔任刺州之前已經表現出來。以郡齋宴集時所作的詩歌作為研究對象，詩人在吏隱時的真實心境，則很容易因酬酢的動機而被忽略。況且韋應物表現吏隱心態的詩歌，不只出現在擔任刺史期間，如果本文單舉郡齋詩，就不能對韋氏的吏隱心態作全面的討論。

因此本章將以郡齋詩作為討論的基礎，旁及郡齋以外的一些篇什，通過研究韋應物在這種特殊的生活狀況——吏隱下所寫的詩歌，進一步了解詩人的性情和詩作的關係。本文將先從韋氏對仕宦的態度入手，然後探討他追求隱逸生活的背後精神，最後分析這些吏隱詩的獨特內涵。

---

²¹⁶ 《校注》，頁 335。

²¹⁷ 侯迺慧：《唐詩主題與心靈療養》（台北：三民書局，2005），頁 183。

²¹⁸ 參該詩注釋第八，見《校注》，頁 337。

²¹⁹ 劉詩題目為〈顧十二左遷，過韋蘇州、房杭州、韋睦州，三使君皆有郡中宴集詩，辭章高麗，鄙夫之所仰慕，顧生既至，留連笑語，因亦成篇，以繼三君之風焉〉，見《校注》，頁 337。

第二節 韋應物對仕宦的態度

開元、天寶為唐代的盛世，經歷這個時期的人普遍都看重功名，滿懷壯志，希望建功樹名，既可以經濟天下，也得到榮華富貴。唐人沈既濟(不詳)的〈枕中記〉寫盧生的黃粱一夢，故事發生在開元七年，盧生對道士呂翁所說的一番話寫照出盛唐人的追求：

「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後可以言適乎。吾嘗志於學，富於游藝，自惟當年青紫可拾。」

220

唐人喜歡給高官寫干謁的詩歌，希望因此得到提拔，顯例有孟浩然(689-740)寫給張九齡(678-740)的〈臨洞庭湖上張丞相〉，朱慶餘(不詳，826年進士)寫給張籍(765-830)的〈近試上張籍水部〉。他們對建功樹名充滿著激情。李白在〈嘲魯儒〉中譏諷：「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分明以經國濟世之任自許。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自謂頗挺出，立當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²²¹ 更是向在位者表明心跡的名句。

至於韋應物，情況則有所不同。他雖生於天寶，經歷開天盛世，卻沒有盛唐人建功立業、出將入相的雄心壯志。另一方面，他的興諷詩，讓我們看到詩人感情激越、關心朝政的一面。他願意入朝當官，為國效力，當看到大臣列班早朝，便說「愧無鴛鴦姿，短翮空飛還。誰當假毛羽，雲路相追攀」²²² 可見詩

²²⁰ 汪辟疆校錄：《唐人小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37。

²²¹ 楊倫：《杜詩鏡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25。

²²² 〈觀早朝〉，見《校注》，頁435。

人有當三衛的經歷，嚮往盛世，所以仍有上進心，希望在京爲官，²²³ 這種矛盾，可以從文化背景來解釋。韋應物畢竟生於盛唐，曾目睹唐朝的盛況，有「恥作明時失路人」²²⁴ 的思想。他在滁州任刺史，聽聞族中有子弟被召入伍，不禁激動地說：「丈夫當爲國，破敵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鬢毛班。」²²⁵ 殺賊衛國之想溢於言表。在韋集中，「不能林下去，祇戀府廷恩」²²⁶、「罷官守園廬，豈不懷渴饑」²²⁷、「幸遭明盛日，萬物蒙生植」²²⁸、「郡有優賢榻，朝編貢士詔」²²⁹ 等等，都表示躬逢盛世，如能當官，就不應隱居避世，而應爲國效力。孔子認爲「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²³⁰ 這是士人對仕宦與隱逸的傳統觀念，韋應物對政治自命直拙，秉持這種觀念，但不過份追求，故對功名利祿的態度，有別於同時期人。

韋應物自命不是政治之材，但其愛民之心及傳統士大夫的責任感成就其良吏之材。他一生官位不高，重要的官職有：洛陽丞、京兆府功曹參軍、高陵令（任京兆府功曹參軍時攝）、鄠縣令、櫟陽令、尚書比部員外郎、滁州刺史、江州刺史、蘇州刺史。宋代朱長文（1039-1098）《吳郡圖經續記》就稱：「若韋應物……亦可謂循吏」²³¹。的確，在外任刺史期間，韋應物一直關懷民生，自慚所作有限。初到滁州，他自嘲「牧人本無術，命至苟復遷」，還說：「甿稅況

²²³ 《韋應物集校注》應爲該詩云「短翮空飛還」，當早年未仕或爲三衛時作。這明顯有誤，韋氏在三衛落職後才折節讀書，作詩也在此時開始，之前不可能有詩作。孫望認爲寫於大曆十年（775）歲初，時自淮海歸於長安。其說比較可信。詳參《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84。

²²⁴ 常建：〈落第長安〉。

²²⁵ 〈寄暢當（聞以子弟被召從軍）〉，見《校注》，頁164。

²²⁶ 〈示從子河南尉班〉，見《校注》，頁70。

²²⁷ 〈洛都游寓〉，見《校注》，頁439。

²²⁸ 〈謝櫟陽令歸西郊贈別諸友生〉，見《校注》，頁251。

²²⁹ 〈題從姪成緒西林精舍書齋〉，見《校注》，頁480。

²³⁰ 《論語·泰伯》

²³¹ 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上。

重疊，公門極熬煎。責逋甘首免，歲晏當歸田。勿厭守窮轍，慎爲名所牽。」²³²

後來到江州上任，看到民生困苦，便全力爲民解困，他慨嘆：「斯民本樂生，逃逝竟何爲。早歲屬荒歉，舊逋積如坻。到郡方逾月，終朝理亂絲。」²³³ 在蘇州，他宴集時不忘「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²³⁴，遊覽時記著「於茲省甿俗，一用勸農桑」²³⁵ 韋應物晚年罷蘇州刺史，家貧如昔，仍爲生計擔憂，要租田耕作；白居易退隱，卻囊中仍有餘錢，可以買田地。²³⁶ 比較之下，韋詩確實塑造了「一個潔身自愛、克己奉公、淡於榮利、惠愛下民的封建官吏形象」，他不願爲虎作倀，但又力量有限，往往愛莫能助，因而常常內心慚愧苦惱，甚至有棄官之意。²³⁷ 因此，韋應物在政治社會貢獻上是一個良吏，不是賢臣。

更重要的是，我們發現韋應物遇到政治上不如意的事，都能安然處順，對榮祿得失處之泰然。他自命蹇劣，不該當高位：「顧迹知爲忝，束帶愧周行」²³⁸、「自當安蹇劣，誰謂薄世榮」²³⁹、「無術謬稱簡，素餐空自嗟」²⁴⁰、「誠知虎符忝，但恨歸路長」²⁴¹。這些都不是反話，看不到懷才不遇的悲哀。反而，面對落職時，韋氏常表現出超然物外之思，不爲世俗名利所累，例如「榮達頗知

²³² 〈答崔都水〉，見《校注》，頁 327。該詩於建中元年秋冬間在滁州作。

²³³ 〈始至郡〉，見《校注》，頁 500。該詩於貞元元年秋初至江州作。

²³⁴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見《校注》，頁 55。該詩於貞元五年夏在蘇州刺史任上作。

²³⁵ 〈登重玄寺閣〉，見《校注》，頁 434。該詩於貞元六年左右在蘇州作。

²³⁶ 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二十五云：「王績之詩曰：『有客談名理，無人索地租。』隱如是，可隱也。陶潛之詩曰：『饑來驅我去，……叩門拙言辭。』如是隱，隱未易言矣。白樂天之詩曰：『冒寵已三遷，歸朝始二年。囊中儲餘俸，園外買閑田。』如是罷官，官亦可罷也。韋應物之詩曰：『政拙欣罷守，閑居初理生。……聊租二頃田，方課子弟耕。』罷官如是罷，恐官正未易罷耳。韋與陶千古並稱，豈獨以其詩哉！」他讚許韋氏人品的正直，這正是良吏所必需的。韋詩題〈寓居永定精舍〉，於貞元七年春罷刺史任在蘇州閑居時作。白居易詩題〈新昌新居書事四十韻因寄元郎中張博士〉。

²³⁷ 楊世明：《唐詩史》（重慶：重慶出版社，1996），頁 371-372。

²³⁸ 〈夜直省中〉，見《校注》，頁 495。

²³⁹ 〈幽居〉，見《校注》，頁 497。

²⁴⁰ 〈郡齋贈王卿〉，見《校注》，頁 159。

²⁴¹ 〈登重玄寺閣〉，見《校注》，頁 433。

疏，恬然自成度」²⁴²、「形跡雖拘檢，世事澹無心」²⁴³、「況將塵埃外，襟抱從此舒。」²⁴⁴、「簪組聊掛壁，焉知有世榮」²⁴⁵、「豈將符守戀，幸已棲心幽」²⁴⁶、「今得罷守歸，幸無世欲患」²⁴⁷。也許我們發現韋應物在初到滁州任職時，常常驚嘆時歲遷逝，但細心分析，就可以發現這種驚時之哀是因懷人惜別而起，與懷才不遇無關。試看〈冬至夜寄京師諸弟兼懷崔都水〉詩：

「理郡無異政，所憂在素餐。徒令去京國，羈旅當歲寒。

子月生一氣，陽景極南端。已懷時節感，更抱別離酸。

私燕席云罷，還齋夜方闌。遽幕沈空宇，孤燈照床單。

應同茲夕念，寧忘故歲歡。川途恍悠邈，涕下一闌干。」²⁴⁸

單看「徒令去京國，羈旅當歲寒」，或者有人會以為他為離開權力中心而傷心，但再往下看，我們就可以發現詩人用時節的變遷、酒闌席散的蕭條來襯托對身處長安的諸弟之思念。所謂「應同茲夕念，寧忘故歲歡」是也。我們不能忽略，韋氏是京兆杜陵人，詩中提及京師會有思親念舊之意。這可參考本論文對韋氏追憶故園詩的分析。

第三節 韋應物的高潔本性

²⁴² 〈休暇東齋〉，見《校注》，頁494。

²⁴³ 〈南園陪王卿遊矚〉，見《校注》，頁450。

²⁴⁴ 〈再遊西山〉，見《校注》，頁452。

²⁴⁵ 〈郡齋感秋寄諸弟〉，見《校注》，頁150。

²⁴⁶ 〈郡中西齋〉，見《校注》，頁502。

²⁴⁷ 〈野居〉，見《校注》，頁507。

²⁴⁸ 《校注》，頁152。此外，韋氏驚時而懷人的詩，也有〈送中弟〉、〈寄別李儋〉、〈元日寄諸弟兼呈崔都水〉、〈社日寄崔都水及諸弟群屬〉、〈寄職方劉郎中〉、〈池上懷王卿〉、〈登樓寄王卿〉等等。

韋應物對仕宦的態度與盛唐人迥異，而偏向於中唐人，究其原因除了因為安史之亂後，政治動蕩，國力日衰以外，也因為他個人的性情稟賦與別不同。關於韋氏的性情，一般研究者都注意到李肇（806-820）《國史補》中一段話：

「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²⁴⁹

高潔澹泊，在韋詩中鮮明地展現出來。奇怪的是，很多研究者不認為這是韋應物性情的基調，只視為在政治黑暗中，用世之志不行，而走上避世之路。例如，鄭佩芳在《唐代詩人評唐詩之研究》中指出：

「韋左司處離亂之世，目睹災民流離失所，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時代，既未能盲目於一切，性又孤潔，未能逢源於渾濁之官場，惟有退而遊於山水，又淡薄自處，不以名利為重，得以休憩林泉後，多為雅淡之作，但恤民之心未愍，故又時有傷世之什。然與老杜心存魏闕，欲兼善天下之心相去頗遠。於元結、孟雲卿之正視現實，欲作中流砥柱之胸襟，亦稍不逮矣。」²⁵⁰

她雖然提及韋氏「性又孤潔」，但說他「未能逢源於渾濁之官場，惟有退而遊於山水」，又批評他不如杜甫、元結、孟雲卿，即不滿韋氏有消極避世思想。此外，劉蔚在〈試論韋應物的吏隱心態與儒道禪思想之關係〉一文中說，由於宦海沉浮、仕途多險，使韋應物長期處於焦慮的精神狀態，可是「儒家的積極用世之心與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使韋應物不能輕易地隱居。在這種進退兩難的情況下，道家與禪宗在心理上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幫助他走上了『吏隱』之路。」²⁵¹這種說法只是將儒、釋、道對中國士人的一般性影響，強套在韋應物身上，未

---

²⁴⁹ 李肇：《唐國史補》（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²⁵⁰ 鄭佩芳：《唐代詩人評唐詩之研究》，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碩士論文，1973年，頁203-204。

²⁵¹ 劉蔚〈試論韋應物的吏隱心態與儒道禪思想之關係〉《徐州教育學院學報》，第16卷第3期（2001年9月），頁35。

曾充份考慮實際情況。

從韋應物詩反覆推敲，高潔澹泊實是他的本性，是他在人生起伏中處世的基本思想。他早在洛陽時就說過「素秉棲遁志」。²⁵² 在任刺史時，他始終保持著這種稟性。試看：

「潔性不可汙，爲飲滌塵煩。此物信靈味，本自出山原。

聊因理郡餘，率爾植荒園。喜隨眾草長，得與幽人言。」²⁵³

他以山中茶葉自比性潔，在眾人俗世裏仍能保持幽靜之性。又如〈餌黃精〉一詩，表面上寫修煉仙丹，主旨卻在「自懷物外心，豈與俗士論。終期脫印綬，永與天壤存」²⁵⁴，象徵自己超然物外的性情。因此，韋應物討厭做官，主要因爲勞役傷害性情，很少因爲政治黑暗、官途蹇滯。詩人反覆強調官宦對其性情有所束縛，例如「吏舍跼終年」²⁵⁵、「軒冕誠可慕，所憂在繫維」²⁵⁶、「腰間銅印與心違」²⁵⁷、「符竹方爲累，形迹一來疏」²⁵⁸、「所嗟累已成，安得長偃仰」²⁵⁹、「到郡方逾月，終朝理亂絲。賓朋未及宴，簡牘已云疲」²⁶⁰，數量相當可觀。

佛、道思想，對韋應物的思想確有影響，但其影響在於提升修養，而高潔澹泊之志趣則早已存在。大曆十四年(780)六月，韋應物辭退櫟陽令，七月抵達長安西郊灋上之善福精舍，閑居於此，約兩年後再任官。這段經歷對我們認識

---

²⁵² 〈酬盧嵩秋夜見寄五韻〉，見《校注》，頁 289。

²⁵³ 〈喜園中茶生〉，見《校注》，頁 525。

²⁵⁴ 〈餌黃精〉，見《校注》，頁 508。

²⁵⁵ 〈東郊〉，見《校注》，頁 463。

²⁵⁶ 〈洛都游寓〉，見《校注》，頁 439。

²⁵⁷ 〈紫閣東林居士叔緘賜松英丸捧對忻喜蓋非塵侶之所當服輒獻詩代啓〉，見《校注》，頁 113。

²⁵⁸ 〈游開元精舍〉，見《校注》，頁 456。

²⁵⁹ 〈藍嶺精舍〉，見《校注》，頁 466。

²⁶⁰ 〈始至郡〉，見《校注》，頁 500。

韋應物性情有很大的幫助，應該多加留意。在善福精舍，他潛心學佛，使其潔淡之性更為超妙。〈澧上西齋寄諸友〉一詩，是韋氏在七月剛到善福精時在西齋所作，他說：

「絕岸臨西野，曠然塵事遙。清川下邇迤，茅棟上嵒嶢。

玩月愛佳夕，望山屬清朝。俯砌視歸翼，開襟納遠飆。

等陶辭小秩，效朱方負樵。閒遊忽無累，心跡隨景超。

明世重才彥，雨露降丹霄。群公正雲集，獨予忻寂寥。」²⁶¹

此詩由寫景入手，由清景引發他的澹泊曠達的性情。所謂「曠然塵事遙」領起一篇之情，以下細寫風景，繼而「閒遊忽無累，心跡隨景超」，最後歸結為「獨予忻寂寥」。寺院幽靜的環境，引發他的高潔本性，與塵世迥異。因此，韋應物說：「山水曠蕭條，登臨散情性」²⁶²、「曠然西南望，一極山水情」²⁶³，山水景色可以幫助他進入寂寥之境，忘記塵世。日後，他在當官的時候，往往以遊覽山水來抒發澹泊之性情。

除此以外，韋應物在善福精舍常與僧人遊，又研習佛理。例如僧人神靜，韋氏曾與他在西齋討論佛理，「究空自為理，況與釋子群」²⁶⁴，又在他的禪院靜修，「方耽靜中趣，自與塵事違」²⁶⁵。經過善福精舍的生活，韋應物覺得自己對道心有所悟，他宣稱：「方以玄默處，豈為名跡侵。法妙不知歸，獨此抱沖襟」²⁶⁶、「道心淡泊對流水，生事蕭疏空掩門」²⁶⁷、「高齋樂宴罷，清夜道心存」²⁶⁸、

²⁶¹ 〈澧上西齋寄諸友（七月中善福之西齋作）〉，見《校注》，頁111。

²⁶² 〈義演法師西齋〉，見《校注》，頁468。

²⁶³ 〈澧上寄幼遐〉，見《校注》，頁125。

²⁶⁴ 〈秋夕西齋與僧神靜遊〉，見《校注》，頁446。

²⁶⁵ 〈神靜師院〉，見《校注》，頁465。

²⁶⁶ 〈善福精舍示諸生〉，見《校注》，頁126。

「我以養愚地，生君道者心」²⁶⁹。對於高潔澹泊的本性，韋應物覺得自己有了佛理的薰陶，就成為道心。

既然本性高潔澹泊，韋應物何不高蹈風塵外，隱跡山林呢？推想原因，第一是傳統士大夫仕宦思想，參見本章第二節；第二在於生活貧困，需要依靠俸祿為生。²⁷⁰ 韋應物有時也會為不能隱居適性而感到苦惱，例如〈答馮魯秀才〉一詩，寫於大曆十三年(779)，那時他還未閑居善福精舍。詩云：

「晨坐枉瓊藻，知子返中林。澹然山景晏，泉谷響幽禽。

髣髴謝陳跡，逍遙舒道心。顧我腰間綬，端為華髮侵。

簿書勞應對，篇翰曠不尋。薄田失鋤耨，生苗安可任。

徒令慚所問，想望東山岑。」²⁷¹

縱使山景使人澹然忘世，但簿書之勞使他無暇作詩，歸耕又力有不逮，結句充滿惆悵之情。後來他慢慢找到調和之道，即所謂「吏隱」，他利用公務餘暇，做到身在塵世而心常清靜。在詩中，他常寫「吏散」後的幽寂，表現「雖居世網常清淨」。²⁷²

總之，在公事餘暇，欣賞山水自然的景色，從繁囂的塵網進入清靜的幽境，其實是韋應物真性情的表現。他既關心民瘼，擔任郡守，也享受郡縣的山林寂

---

²⁶⁷ 〈寓居澧上精舍寄于張二舍人〉，見《校注》，頁127。

²⁶⁸ 〈奉酬處士叔見示〉，見《校注》，頁318。

²⁶⁹ 〈酬令狐司錄善福精舍見贈〉，見《校注》，頁322。

²⁷⁰ 參考蔣寅《大曆詩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78；劉蔚〈試論韋應物的吏隱心態與儒道禪思想之關係〉《徐州教育學院學報》，第16卷第3期（2001年9月），頁34-35。

²⁷¹ 〈答馮魯秀才〉，見《校注》，頁312。

²⁷² 〈縣內閑居贈溫公〉：「滿郭春色嵐已昏，鴉栖散吏掩重門。雖居世網常清淨，夜對高僧無一言。」見《校注》，頁105。其他如〈社日寄崔都水及諸弟群屬〉「山郡多暇日，社時放吏歸」（《校注》，頁155）、〈寄楊協律〉「吏散門閣掩，鳥鳴山郡中」（見《校注》，頁158），也提及吏散後的閑居生活。

靜，現實中遂表現為一種吏隱的狀況。「腰懸竹使符，心與廬山緇」²⁷³、「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情」²⁷⁴、「出處似殊致，喧靜兩皆禪」，²⁷⁵ 這些都是韋氏強調的兼得之境。宋人葛立方認為：「韋應物〈奉謝處士叔〉詩云：『高齋樂宴罷，清夜道相存』道貴沖寂，宴主歡暢，二者恐不能相兼也。」²⁷⁶ 從上文的分析，韋詩不但能兩者相兼，甚至創造了一種新的藝術特色。

第四節 韋應物吏隱詩的藝術特色

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知道韋應物的吏隱詩包含了塵世之念和道心。這兩方面的混和與調諧，便形成了一種新詩境。韋應物在吏隱詩中表現出的是，由喧囂紛攘、營營役役的俗世，進入澹泊安閒、幽靜寂寥的世界。它的意義在於性情的散發，心境進入高潔澹泊的過程；由於詩中顯現了塵世的苦惱，更能見出道心的幽寂。論者一面倒地說他的詩風雅淡遠，或者片面地強調韋詩禪意盎然，實在都是有所忽略的。²⁷⁷

以下通過懷人、遊覽、宴集和閑適生活四種內容剖析韋應物吏隱詩由塵俗進入清閑心境的表現力量：

---

²⁷³ 〈郡內閒居〉，見《校注》，頁 496。

²⁷⁴ 〈幽居〉，見《校注》，頁 497。

²⁷⁵ 〈贈琮公〉，見《校注》，頁 170。

²⁷⁶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四。

²⁷⁷ 前者參李軍〈「心同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徹底清」——論韋應物的清美詩風〉《新鄉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16 卷第 1 期（2002 年 2 月），頁 24-26。後者參王娟〈淺析禪宗對韋應物的影響〉《運城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20 卷第 1 期（2002 年 2 月），頁 47-49。又例如劉蔚〈試論韋應物的吏隱心態與儒道禪思想之關係〉雖然指出韋應物的二元人格，但只強調禪、道給他虛靜的創作心態、大量創作清潤淡美的山水田園詩，儒家思想使他寫田園詩有憫農思想，頁 36-37。

（一）懷人

韋應物相當重視友情，詩集內寄贈詩相當多。當他遠到滁州等地任刺史，常有思念諸弟朋友的詩歌。這些詩情感悲傷，表現詩人鬱鬱寡歡的情懷。例如〈冬至夜寄京師諸弟兼懷崔都水〉說：「已懷時節感，更抱別離酸」²⁷⁸、〈元日寄諸弟兼呈崔都水〉說：「日月昧還期，念君何時歇」²⁷⁹，都是抒發思念之苦。這些詩都不能構造新詩境，不屬於我們要討論的範圍。

韋詩中有一些寫思念幽人或者僧人的作品，刻意經營高潔的意境，使人有超凡脫俗的感覺。〈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是韋應物的名作，寫於蘇州刺史任上，詩云：「懷君屬秋夜，散步咏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眠。」²⁸⁰ 論者多欣賞其句調雅淡。但我以為其妙處還在於透過懷人，傳達一份難以名狀的幽情。「山空松子落」正象徵心境的幽寂。另一首名作〈寄全椒山中道士〉，更有代表性。詩云：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

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²⁸¹

第一句點出自己在塵世的困境，後然透過「忽念山中客」，想像道士的幽姿，最後兩句流露出淡遠的意興。全詩空靈幽靜，有遠離塵世，飄然入道之趣。張

---

²⁷⁸ 《校注》，頁 152。

²⁷⁹ 《校注》，頁 153。

²⁸⁰ 《校注》，頁 194。

²⁸¹ 《校注》，頁 173。

謙宜說它「無煙火氣，亦無雲霧光，一片空明，中涵萬象。」²⁸² 確實非常恰當。

除〈寄全椒山中道士〉外，例子還有不少，如〈贈琮公〉：「山僧一相訪，吏案正盈前。出處似殊致，喧靜兩皆禪。暮春華池宴，清夜高齋眠。此道本無得，寧復有忘筌。」²⁸³ 吏案之上，書牘堆疊，本是惱人之事，但山僧相訪，使詩人道心無礙，得入禪境。〈寄恆璨〉云：「心絕去來緣，跡順人間事。獨尋秋草徑，夜宿寒山寺。今日郡齋閒，思問楞伽字。」²⁸⁴ 郡齋無事，想起當年夜宿禪寺，向僧人求教佛理。「心絕去來緣，跡順人間事」亦是今日所悟之理。〈郡齋贈王卿〉云：「無術謬稱簡，素餐空自嗟。秋齋雨成滯，山藥寒始華。漚落人皆笑，幽獨歲逾賒。唯君出塵意，賞愛似山家。」²⁸⁵ 詩人本來自嘆漚落，自責素餐，但幽人出塵之意，使他以「山家」自許，欣賞自然風景，不為外物所累。

（二）遊覽

山水風光最能使人忘懷世情，正如前面第三節所引「山水曠蕭條，登臨散情性」²⁸⁶，韋應物也不例外，在遊覽山水間往往能體味澹泊幽寂之境。這些山水詩有常用的結構：先點出刺史職務之苦況，再細緻刻劃景色，達到物我兩忘之境，最後抒情自遣，表現沖淡自然的襟抱。這種結構令人想起謝靈運的山水詩，它也有一個常用的結構：往往先寫行程，出發時地，再隨行程依次描寫景色，

²⁸² 《視齋詩談》卷五，見《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 851。

²⁸³ 《校注》，頁 170。

²⁸⁴ 《校注》，頁 172。

²⁸⁵ 《校注》，頁 159。

²⁸⁶ 〈義演法師西齋〉，見《校注》，頁 468。

並以兩兩對舉的景物佈局，構造詩句，最後抒情言理，多言出世求仙。李軍認為：「韋詩既得陶詩以抒懷寫意為主，清新自然的風神，又吸取二謝刻劃山水景物細致逼真，精工流麗的特點，博採眾長，自成一家。」²⁸⁷ 其實，韋應物學習謝靈運的，又豈只辭藻流麗細緻呢？亦在於組織安排，以及抒情方式。

對於吏隱詩中的山水題材，以下舉出一些例子，並稍加分析說明。韋應物〈同元錫題瑯琊寺〉詩云：

「適從郡邑喧，又茲三伏熱。山中清景多，石罅寒泉潔。

花香天界事，松竹人間別。殿分嵐嶺明，磴臨懸壑絕。

昏旭窮陟降，幽顯盡披閱。嶽駭風雨區，寒知龍蛇穴。

情虛澹泊生，境寂塵妄滅。經世豈非道，無爲厭車轍。」²⁸⁸

首兩句寫夏天悶熱和喧鬧，與末兩句合看，以炎夏象徵公務的繁瑣。然後寫瑯琊寺的風景，「花香天界事，松竹人間別」，詩人未必要刻劃仙境，卻有意營造一個超凡絕俗的寂寥之境。於此，詩人「情虛澹泊生，境寂塵妄滅」。又如〈遊瑯琊山寺〉：

「受命恤人隱，茲遊久未遑。鳴騶響幽澗，前旌耀崇岡。

青冥臺砌寒，綠褥草木香。填壑躋花界，疊石構雲房。

經製隨巖轉，繚繞豈定方。新泉泄陰壁，高蘿蔭綠塘。

攀林一栖止，飲水得清涼。物累誠可遣，疲忙終未忘。

還歸坐郡閣，但見山蒼蒼。」²⁸⁹

首兩句寫察訪民情之勞，然後詩人被幽景所吸引，愈寫愈幽，初時還有「鳴騶」、

²⁸⁷ 李軍：〈「心同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徹底清」——論韋應物的清美詩風〉，頁 26。

²⁸⁸ 《校注》，頁 482。

²⁸⁹ 《校注》，頁 472。

「前旌」等官府之物，後來是寒砌綠草，再走到寺院，冷泉叢蘿，最後一飲清涼的泉水，有醍醐灌頂之意。詩人遂感到物累可遣，不爲所拘束。又如〈再遊西山〉：

「南譙古山郡，信是高人居。自歎乏弘量，終朝親簿書。

於時忽命駕，秋野正蕭疏。積逋誠待責，尋山亦有餘。

測測石泉冷，曖曖煙谷虛。中有釋門子，種果結茅廬。

出身厭名利，遇境即躊躇。守直雖多忤，視險方晏如。

況將塵埃外，襟抱從此舒。」²⁹⁰

「自歎乏弘量，終朝親簿書」是簿牘之勞，詩人忽然想到秋天蕭疏的景色，出外遊覽，感到名利之可厭，最終「況將塵埃外，襟抱從此舒」，把簿牘之勞拋開，安閑的性情自然地舒展出來。又如〈南園陪王卿遊囑〉：

「形跡雖拘檢，世事澹無心。郡中多山水，日夕聽幽禽。

几閣文墨暇，園林春景深。雜花芳意散，綠池暮色沈。

君子有高躅，相攜在幽尋。一酌何爲貴，可以寫沖襟。」²⁹¹

首句稍露塵事的拘束，次句便點出自己澹泊的胸懷。然後與友人一起在山水中尋找幽情，在暮春景色中，一起玩弄文翰，開懷飲酒，於是沖淡的襟懷得以抒發。從以上的例子，我們可以發現韋應物不爲物累，但也不離塵世，故其詩沒有王維詩的禪意，而多一點面對人間的自然澹泊的生活態度。

（三）宴集

---

²⁹⁰ 《校注》，頁 452。

²⁹¹ 《校注》，頁 450。

在職務的閑暇，刺史常愛在郡齋中文會宴集，有時則爲送別而飲宴。在開懷暢飲之中，詩人盡情享受朋友間投契的歡樂。況且詩歌往還唱酬，可忘卻人間煩惱。韋應物在滁州寫了〈郡樓春燕〉：

「眾樂雜軍鞞，高樓邀上客。思逐花光亂，賞餘山景夕。」

爲郡訪彫瘵，守程難損益。聊假一杯歡，暫忘終日迫。」²⁹²

本來「爲郡訪彫瘵，守程難損益」是困苦的，但「聊假一杯歡，暫忘終日迫」，在春宴中獲得了快樂。這首詩的調子還嫌有些憂愁，後來在蘇州刺史任上作的〈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則清新歡暢，雍容閒雅，歷來廣受推崇。詩云：

「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

煩痼近消散，嘉賓復滿堂。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

理會是非遣，性達形跡忘。鮮肥屬時禁，蔬果幸見嘗。

俯飲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歡體自輕，意欲凌風翔。

吳中盛文史，群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疆。」²⁹³

「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煩痼近消散，嘉賓復滿堂。」由天氣清涼，嘉賓雲集寫出心情開朗，所謂「神歡體自輕」。這時他已「理會」、「性達」，不爲刺史之實務所困擾了。劉太真曾唱和此作，韋應物再酬唱一首，所營造的意境亦很相近，如：「風雨飄海氣，清涼悅心神。重門深夏晝，賦詩延眾賓」、「朋友亦遠集，燕酌在佳辰」²⁹⁴，寫夏風清涼，寫詩友相得。

這些宴集之詩不僅反映郡守的生活，最重要的是，表現了韋應物的澹泊性情。因此，這些詩不會給人俗不可耐的繁囂，而是清幽潔雅的環境與心境。很

---

²⁹² 《校注》，頁 54。

²⁹³ 《校注》，頁 55。

²⁹⁴ 〈酬劉侍郎使君（劉太真）〉，見《校注》，頁 335。

多時，宴集會與遊覽山水結合起來，強調自然風光澹泊的一面。例如在〈襄武館遊眺〉，韋應物說：

「州民知禮讓，訟簡得遨遊。高亭憑古地，山川當暮秋。是時杭稻熟，西望盡田疇。仰恩慚政拙，念勞喜歲收。澹泊風景晏，繚繞雲樹幽。節往情惻惻，天高思悠悠。嘉賓幸雲集，芳樽始淹留。還希習池賞，聊以駐鳴騶。」²⁹⁵

首兩句點出完成公家事的閒適，自有優遊的樂趣。然後寫田園的景色，還夾雜了郡守愍農的心聲，但以澹泊風景來承接，詩情頓時變得淡遠。最後以嘉賓宴集，樂而忘返作結，避免主觀的批評或申訴，首尾都顯出郡守的身分，互相呼應，民生安定，便自得其樂。「習池」用晉山簡事，時值四方寇亂，天下分崩，但他仍優游卒歲，終日醉酒，不理世事。可見韋詩之旨不在歌功頌德，而是要寫出閒雅淡遠的心情，令人生悠悠之思。

（四）閒居生活

韋應物喜愛公事後的閒居生活，他往往能離開塵境，回到自己的高潔性情。所以韋詩寫公暇的閒居生活，數量亦不少，而且時常帶有比喻性質，寄寓了自己高潔的性情。例如，他在蘇州有西齋，是閒居養生之地。曾寫〈新理西齋〉詩說：

「方將叱訟理，久翳西齋居。草木無行次，閒暇一芟除。

春陽土脈起，膏澤發生初。養條刊朽枿，護藥鋤穢蕪。

稍稍覺林聳，歷歷忻竹疏。始見庭宇曠，頓令煩抱舒。

---

²⁹⁵ 《校注》，頁 458。

茲焉即可愛，何必是吾廬。」²⁹⁶

作者仔細地描寫了公餘時間整理西齋的經過，本來是草木叢生的，經過剪除衰朽，保護長條，使庭園重現生機，「稍稍覺林聳，歷歷忻竹疏」。後來又寫了〈復理西齋寄丘員外〉說：

「前歲理西齋，得與君子同。迨茲已一周，悵望臨春風。

始自疏林竹，還復長榛叢。端正良難久，蕪穢易爲功。

援斧開眾鬱，如師啓群蒙。庭宇還清曠，煩抱亦舒通。

海隅雨雪霽，春序風景融。時物方如故，懷賢思無窮。」²⁹⁷

一年過後，西齋的蕪穢重生，詩人要「援斧開眾鬱」，欣賞初春的景色。他將芟夷蕪穢說成「如師啓群蒙」，便有更深一層的含義。再加上，前一首詩說：「始見庭宇曠，頓令煩抱舒」，這一首說：「庭宇還清曠，煩抱亦舒通」，就可以見出韋應物的匠心，希望用整理西齋來表達整理心緒的意思。西齋得理，象徵詩人的心情由世俗進入曠達無礙的境界，不爲塵事所累。

除了西齋，韋應物也用了其他閒居所見的景物來寫其幽情。例如〈郡齋移杉〉寫他從滁州西南琅琊山寺，將杉樹移植到郡齋。詩云：

「櫨幹方數尺，幽姿已蒼然。結根西山寺，來植郡齋前。

新含野露氣，稍靜高窗眠。雖爲賞心遇，豈有巖中緣。」²⁹⁸

這棵杉樹好比他的道心，由寺院落入郡齋，注定要爲塵事而煩惱，只有幽靜之姿，而無神仙之緣。又如〈花徑〉，寫花徑之幽寂以表示「自是塵外踪，無令

---

²⁹⁶ 《校注》，頁 503。

²⁹⁷ 《校注》，頁 201。

²⁹⁸ 《校注》，頁 526。

吏趨急」²⁹⁹。還有前面曾提及的〈喜園中茶生〉，以山中茶葉自比高潔性情，也是一例。³⁰⁰

第五節 小結

有學者從統計學的角度，歸納出韋應物隱逸詩中常用冰、枯、寒、寂、清、空、孤、獨、殘、蕭條、惆悵等字詞，遂得出「韋應物詩歌中哀怨傷感是他創作的主軸」的結論。³⁰¹ 然而總結本章的討論，韋應物的吏隱詩讓我們欣賞到的是一種自然曠達的人生態度。這種態度表現在詩作上時，詩人用工麗的筆法描寫吏隱生活，或懷人，或遊覽，或宴集，或閒居。詩人曾說過：「似與塵境絕，蕭條齋舍秋」³⁰²、「盥漱忻景清，焚香澄神慮」³⁰³，在清景、秋景中，可以澄神慮，絕塵境。為求將不為物累心境融合於詩境之中，詩人因此極力營造出寂寞蕭條的意境，只有在孤獨幽靜的環境，詩人才能澹然面對外物，將自己的高潔本性表露無遺。因此，韋詩中冷峭字詞的運用並非為了表達哀怨感傷的情緒，相反，是為了表現出詩人越然物外的本性，亦即所謂「沖淡蕭散」³⁰⁴。

第六章 總結

本文第三章討論韋應物興諷詩，由此可以看到經歷喪亂後折節讀書，在儒

---

²⁹⁹ 《校注》，頁 527。

³⁰⁰ 〈喜園中茶生〉，見《校注》，頁 525。原詩及分析可參本章第三節。

³⁰¹ 莊宗榮：〈論韋應物的隱逸詩〉《福建商業高等專科學報》，1999 年 10 月，頁 20-22。

³⁰² 〈郡中西齋〉，見《校注》，頁 502。

³⁰³ 〈曉坐西齋〉，見《校注》，頁 504。

³⁰⁴ 倪瓚：「韋、柳沖淡蕭散，皆得陶之旨趣，下此則王摩詰矣。」〈謝仲野詩序〉《清閨全集》卷十，轉引自《校注》附錄五，評論，頁 644。

家思想影響下，詩人對國家社會人民的責任心。韋應物在詩中表現出一種激越的真性情，一方面強調自己剛直的本性，不能與混濁的官場妥協；一方面對世道不靖予以痛擊。這一部份的作品讓我們看到較為陌生的韋應物，因為前人往往以「淡泊」概括韋應物，至使我們一直忽略韋應物的其他性格面貌。韋應物的興諷詩研究正好填補了這一塊空隙。

其實前人學者並非完全忽視韋應物的興諷之作，例如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已點出「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然而學者們往往囿於分期之說，認為韋應物性情中激越的一面只是少年初入仕時的情況，隨着出仕日久，熱情也漸漸減退。通過詳細的資料搜集和詩作分析，本文發現事實並非如此。韋應物一生的感情基調是關心民瘼，希望當一個良吏，即使到了暮年刺蘇州，韋應物仍以爲民謀福祉爲己任。

安史之亂不僅令唐室由盛轉衰，也驚醒了一代人的美夢。曾經經歷開元天寶時期的詩人難免以玄宗朝作爲盛世的象徵，期望亂事平定後，唐室可以回復昔日景象。離開開天盛世時期越久的詩人越迷戀這一夢幻時期，這是因爲唐皇朝的一蹶不振和殘酷的現實令唐代詩人感到失望，唯有透過追憶開元天寶盛世作爲逃離現實的出路。因此我們可以在中唐詩歌中看到追憶主題反覆出現。韋應物曾任玄宗三衛侍郎，陪伴君王出巡遊幸，受盡恩寵，親眼目擊盛世境況，自然也對這一時期充滿眷戀，遂在詩中表現這一精神面貌。在第四章中，我們深入探討韋應物的追憶詩。通過詳細分析，發現韋應物實有兩類追憶作品。第一類以開天盛世作爲追憶對象，通過「驪山」、「前朝遺民」等「斷片」作爲回溯的媒介，引領詩人回到永遠失落了過去。由於韋應物本身是「樂園的見證人」，故能觸發他追憶的「斷片」較一般人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驪山」這一

特殊的「斷片」，它對詩人有着特別意義。「驪山」是韋應物任三衛時期玄宗賜浴的地方，它不僅象徵一個繁盛的時代，也是詩人一生最光輝歲月的象徵。追憶開元天寶對韋應物來說，除了是對盛世的緬懷，也是對自己光輝歲月的悼念，由此可以看到詩人消極失落的情緒面貌。

但必須留意的是詩人還有另一類追憶詩，這類詩追憶的落足點不再是開元天寶時期，避亂寶意寺時期、閑居灋上善福精舍時期，甚至沒有特指時間的「故園」都成為詩人追憶的對象，它們的共通點是當時詩人離開官場閑居，表現出詩人對閑適生活的嚮往。追憶內容的改變反映出詩人情志的轉變，明白到不能停留在過去的光輝歲月，同時進一步確定自己的生命追求——心靈的幽靜淡泊。

韋應物雖與陶淵明、王維等人並稱，但他其實從未徹底離開過官場。詩人如何融和混濁的塵囂和求真自然的性情？本文第五章韋應物的吏隱詩梳理其中的關係與脈絡。

韋應物一生官位低微，故不能稱其居官如隱的生活為「仕隱」，只可以稱為「吏隱」。吏隱包含吏勞心勞力的生活，既要面對營營役役的公務，也要有惠及百姓的熱誠。吏隱的詩人官卑位輕，不能全身遠害，逃避憂患，只能夠在心靈上超越塵世。從韋應物的吏隱詩，我們看不到一般論者所謂的「哀怨傷感」，反而是一種心境的澄明、淡泊。這是韋應物對仕宦的態度和天性澹泊融合的結果。

通過三類韋應物詩作的重要主題分析，我們更能掌握韋應物具體的性格層次和精神面貌，詩人性情以淡泊為主，亂後決心過與盛世時不一樣的人生，為人民貢獻，遇到不公平現象時，也會在詩中表現激越情緒，惟其出仕的原因不在於建功立業，當遇到失意時，詩人往往能安然處順，在透過追憶重構盛世樂

園景象和閑適生活中，漸漸確立人生終極追求目標，形成一種淡泊的風格。

從唐詩的發展史看，韋應物生於盛唐，雖經喪亂，但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仍能在詩人身上體現，與中晚唐普遍流露的「哀怨感傷」不同。可是，相對於盛唐詩人的自信豪氣，韋應物明顯表現得較為黯淡，沒有盛唐人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頗有艱苦經營之態。拿韋應物的詩作與中唐大量湧現的同主題作品比較，本文發現韋應物對開元天寶的眷戀相對較為冷靜。由此，本文以為，韋應物是唐朝由盛轉衰的過渡，宇文所安以「盛唐的輓歌」稱之，是非常有見識的。

參考書目

❖ 本書目之中文著作以作者姓氏之漢語拼音爲序，作者姓氏相同，則以作者名字作爲序次之計算，如此類推。同作者則按著作發表年份爲序。

甲、篇章

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與元九書〉《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陳友琴：〈韋應物和白居易〉、〈讀《韋蘇州集》札記〉《溫故集》（上海：中華書局，1959年）。

儲仲君：〈韋應物詩分期的探討〉《文學遺產》1984年第12期。

儲仲君：〈「韋蘇州之疏淡」及其他〉中國唐代文學學會、西北大學中文系、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主編：《唐代文學研究》第五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10月。

方良：〈從韋應物江淮詩看「陶、韋」異同〉《九江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

房日晰：〈韋應物樂府歌行論略〉《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3期第26卷（總第92期）。

房日晰、盧鼎：〈韋應物柳宗元五言古詩之比較〉《晉陽學刊》1996年第2期。

傅貴：〈滁州西澗尋幽〉《國文天地》1996年第12卷第2期。

傅璇琮：〈韋應物繫年考證〉《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96）。

高海夫：〈中唐詩人韋應物〉《陝西大學學報》1974年第11期。

高海夫：〈李儋元錫考——讀韋應物詩札記〉《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23卷4期。

黃永武：〈青山澹吾慮——韋應物詩欣賞〉《明道文藝》1980年第48期。

姜光斗、顧啓：〈《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的作者爲韋應物考〉《南京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

姜光斗、顧啓：〈關心民生疾苦的詩人韋應物〉《文史知識》1983年第5期。

姜光斗、顧啓：〈韋應物任蘇州刺史時的建樹和晚年概況〉《蘇州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

吉川幸次郎、章培恒等譯：〈韋應物的詩〉《中國詩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景剛：〈韋應物與滁州〉《北京大學學報（國內訪問學者、進修教師論文專刊）》2003年。

李良燐：〈李儋的字不是「元錫」也不是「幼遐」〉《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4期。

李良燐：〈韋應物未罷江州刺史任〉《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4期

李世英、侯潤章：〈近年來韋應物研究之檢論〉《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

年第 2 期。

李廷先：〈試論劉長卿和韋應物詩歌的思想性〉《上饒師專學報》1983 年第 2 期。

李無未：〈韋應物詩韻系〉《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 期 1994 年。

廖仲安：〈韋應物〉呂慧鵬、劉波、盧達編：《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第二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3)。

林水椽：〈從橫眉怒目到焚香掃地——談韋應物詩的憤慨和平淡〉《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998 年第 3 期。

劉逸生：〈韋應物「寄全椒山中道士」〉、〈韋應物「初發揚子寄元大校書」〉《唐詩廣角鏡》(台北：丹青出版社，1983)。

劉逸生：〈閒適自得——韋應物「滁州西澗」〉《唐詩的滋味》(台北：天山出版社，1983)。

陸山：〈憤慨與平淡——論韋應物詩歌不同的審美追求〉《哈爾濱學院學報》第 24 卷第 11 期 2003 年 11 月。

羅聯添：〈韋應物年譜〉《唐代文六家年譜》(台北：學海出版社，1986 年 7 月)。

馬現誠：〈佛教與韋應物及其詩〉《東岳論叢》1999 年第 20 卷第 4 期。

彭多：〈淺談禪宗對韋應物創作的影響〉《西藏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 年第 2、3 期(總第 74、75 期)。

沈檢江：〈晚唐詩：感傷情調的全方位滲透〉《求是學刊》1994 年第 5 期。

沈文凡：〈大曆詩壇上一支獨異的花朵——論韋應物詩歌的藝術特徵〉《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 年第 1 期。

沈文凡：〈韋應物詩歌對陶詩的繼承〉《陝西師範大學繼續教育學報(西安)》2001 年 12 月第 18 卷第 4 期。

施蟄存：〈韋應物：自敘詩二首〉《唐詩百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孫映達：〈論韋應物的人格轉換及其典型詩風〉《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7 卷第 1 期 2001 年 3 月。

陶敏：〈韋應物生平新考〉《湘潭師範學院學報》1998 年第 1 期。

湯擎民：〈論韋應物的「興諷詩」〉《文學遺產》1981 年第 3 期。

唐嗣德：〈閒適淡遠，幽麗清新——韋應物《滁州西澗》詩賞析〉《語文月刊》1996 年第 174 期。

童強：〈論韋應物山水田園詩的寫實傾向〉《文學遺產》1996 年第 1 期。

王熙元：〈韋應物及其詩的風格特色〉《木鐸》1980 年第 9 期。

夏濟安：〈韋應物〉《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9)。

夏敬觀：〈說王孟韋柳〉《唐詩說》(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12 月)。

熊建國：〈《韋應物系年考證》補遺〉《重慶師院學報哲社版》1997 年第 3 期。

胥雲：〈論韋應物詩歌的淡美風格〉《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92 年第 3 期。

胥雲：〈韋應物事迹考評〉《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 年第 2 期。

許總：〈論大曆詩歌意境特徵及其構造方式〉《河北學刊》1998.1。

羊春秋：〈「真而不樸，華而不綺」的詩人韋應物〉《唐詩百講》（廣州：廣州文化，1989）。

虞莎：〈說韋應物長安遇馮著詩〉《文史》1965 年第四輯。

張天健：〈試論韋應物及其詩歌〉《貴州大學學報》1986 年第 3 期。

趙昌平：〈韋柳異同與元詩變〉《趙昌平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鄒西禮：〈韋應物詩歌淵源及影響〉《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 年第 28 卷第 1 期。

鄒西禮：〈韋應物的交游與其詩歌創作的關係〉《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 年第 2 期（總第 82 期）。

周允中：〈兩個韋應物的一場疑案〉《文苑漫步》1999 年第 5 期。

莊宗榮：〈哀怨感傷：韋應物詩歌創作的主要特色〉《寧德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 年第 4 期（總第 63 期）。

乙、學位論文

朱蓓嫻：《韋應物詩研究》（香港：香港大學哲學碩士論文，1998）。

崔成宗：《韋蘇州及其詩之研究》（台灣：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1980）。

盧明瑜：《韋應物詩研究》（台灣：國立台灣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1990）。

許湘瑩：《韋應物山水詩研究》（台灣：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1999）。

楊文惠：《韋應物詩研究》（台灣：國立清華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2000）。

趙夏霜：《韋應物及其詩之研究》（台灣：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哲學碩士論文，2002）。

丙、專著

岑仲勉：《隋唐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查屏球：《唐學與唐詩——中晚唐詩風的一種文化考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陳國球：《唐詩的傳承——明代復古詩論研究》（台北：學生書局，1981）。

陳銘：《意與境——中國古典詩詞美學三昧》（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

程毅中：《中國詩體流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98）。

鄧仕樑：《唐宋詩風——詩歌的傳統與新變》（台北：台灣書店，1998）。

萩原朔太朗著、徐復觀譯、陳淑女校訂：《詩的原理》（台北：學生書局，1989）。

-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註一至五冊》(北京：中華書局，1999)。
- 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
- 傅璇琮：《唐代科學與文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3)。
- 高步瀛：《唐宋詩學要上、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葛曉音：《山水田園詩派研究》(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
- 侯迺慧：《唐詩主題與心靈療養》(台北：三民書局，2005)。
- 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89)。
- 吉川幸次郎：《中國詩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 季羨林主編：《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隋唐五代文學研究(上、下)》(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 蔣寅：《大曆詩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蔣寅：《大曆詩人研究上、下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
- 鄭健行、陳永明、吳淑鈿選編：《韓國詩話中論中國詩資料選粹》(北京：中華書局，2002)。
- 李清筠：《時空情境中的自我影像——以阮籍、陸機、陶淵明詩為例》(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
- 林水椽：《古典文學論叢》(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5)。
- 林文月：《山水與古典》(台北：三民書局，1996)。
- 劉開揚：《唐詩通論》(成都：巴蜀書社出版社，1998)。
- 柳宗元：《柳宗元集一至四冊》(北京：中華書局，2000)。
-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歐麗娟：《唐詩的樂園意識》(台北：里仁，2000)。
- 浦起龍：《讀杜心解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0)。
- 齊濤箋注：《韋莊詩詞箋注上、下冊》(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
- 喬象鍾、陳鐵民：《唐代文學史上、下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 秦惠民：《中國古代詩體通論》(武漢：華科技大學出版社，2001)。
- 屈子規、屈子娟：《唐詩勾趣》(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
- 阮忠：《唐宋詩風流別史》(湖北：武漢出版社，1997)。
- 沈德潛：《古詩源》(北京：中華書局，2000)。

- 孫昌武：《道教與唐代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 孫昌武：《文壇佛影》（北京：中華書局，2001）。
- 孫昌武：《禪思與詩情》（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孫望編著：《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2）。
- 陶敏、王友勝校注：《韋應物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王南：《中國詩性文化與詩觀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 王曉路：《西方漢學界的中國文論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2）。
- 王運熙、顧易生：《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上、下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 王運熙、顧易生：《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上、下冊）》（上海：復旦大學，2002）。
- 王運熙、楊明：《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聞一多：《唐詩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吳相洲：《唐代歌詩與詩歌——論歌詩傳唱在唐詩創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北京：北大出版社，2000）。
- 吳相洲：《唐詩十三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
- 蕭滌非撰：《蕭滌非說樂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薛瑞生：《樂章集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02）。
- 顏進雄：《唐代遊仙詩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
- 嚴雲受：《詩詞意象的魅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宇文所安：《初唐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 宇文所安：《盛唐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 宇文所安：《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 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北京：北京大學，2002）。
- 袁行霈：《唐詩風神及其他》（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5）。
- 余恕誠：《唐詩風貌》（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
- 張晶、白振奎、劉潔：《中國古典詩學新論》（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
- 張淑瓊：《韋應物等 21 人》（台北：地球出版社，1992）。
- 周裕鍇：《中國禪宗與詩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